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2月29日第4期 总第15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50期

## 北京师范大学文革研究专辑（一）

### 目 录

#### 【专 稿】

赵惠中 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

#### 【评 论】

七尺从天 如果她还活着——话说北师大井冈山头头谭厚兰

#### 【述 往】

蔡鸣乔 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从被囚到平反

冯启明 鲜为人知的故事——张闻天关押在北师大

赵惠中 怀念“插班生”杨以鸿

#### 【资 料】

1. 首都红代会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严正声明（1967年4月13日）

2. 为建立我校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而斗争

——谭厚兰同志代表公社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摘登）（1967年4月21日）

3.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通告（校革委会委员名单）（1967年4月29日）

4. 谭厚兰在“九·一”保林会上的讲话（1967年9月1日）

5. 关于北京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1967年12月11日）

#### 【读者来信】

1. 蔡鸣乔谈北师大文革的三阶段

2. 傅正伟谈北师大老五届的历史责任

#### 【本刊声明】

【专稿】

## 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

赵惠中

我是北师大物理系64级的学生。是文革初期最早的造反派之一，由于对文革中一系列事件越来越看不懂，特别是在“余秋里问题”上，周总理要保余秋里，而戚本禹坚决要打倒余秋里，让人感到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我早在67年春季开始就逐渐淡出了文革。因此既没被办“5·16分子学习班”，也没被军宣队、工宣队押送到怀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北师大早期造反派中极少数后期没挨整的几个人之一。淡出的含意是不冲在最前面了，但仍密切关注文革中的重大动态，所以至今尚有话语权。

综观北师大文革，它在全国至少有“六大最”：

1. 1966年7月16日孙有余成为全国第一个被撤职的工作组组长；
2. 1966年11月份谭厚兰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属全国第一大群众组织最先造孔夫子的反；
3. 1967年9月7日谭厚兰成为全国第一个被下属抓起来的革委会主任；
4. 1967年4月以井冈山造反兵团为主体猛烈“炮轰谢富治”轰动了北京市；
5. 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全国最后一个解散的群众组织，解散时是动用了军队一下子抓了100多人，状况极其惨烈；
6. 六四、六五两个年级的学生直到1972年4月才被毕业分配，是全国同年级大学生中最后一个被分配的。

下面就北师大文革谈谈自己的看法。

### 一. “六·二〇”事件

在1966年6月1日前，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已被定性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而被砸烂，重新成立了以李雪峰为书记的新市委。北师大校党委难逃黑帮据点的嫌疑。所以在6月1日广播了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后，北师大立即出现了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仅几天时间北师大党委就垮了。

6月6日，新市委就派出了以孙有余（一机部副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师大领导师大文革。可是好景不长，6月20日早上数一（2）的高树奎等十七位同学在北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题为“孙有余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讲工作组进校后就把校党委一批干部集中在主楼办学习班，将他们与群众隔离开了，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短短一、二个小时内获得了500多张大字报的支持。我与李庆林、武世文等共五位同学也贴了一张支持高树奎的大字报。

约八点，孙有余作了广播讲话，大讲：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说什么“一条游鱼三个浪，三条游鱼九个浪”等等。于是北师大立即掀起了抓“反革命”、“抓游鱼”的新高潮。此时我们5人就在我们自己贴的大字报附近听孙有余讲话，孙有余话音刚落，以教育系为主的一帮人在我班同学的引领下，就把我们五人推上一个木台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批斗。

从6月20日到7月16日孙有余被罢官止，我们当了26天的“反革命”。在这26天中李庆林、我、武世文三人被批斗多次，有一次在物理楼110，是系工作组组织的。参加人多达几百人，整个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批斗会上“打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口号声此起彼伏。会上反复追问我们到哪里去上访，见到了谁？说了什么？我们基本上采取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对策。此会足足开了二个多小时，最后工作组宣布我们三人为“反动学生”。批判我们的大字报贴在东饭厅东墙上，我们的名字上都被打了红叉，名字被倒贴。班上有的同学还动手打了我（这同学在我班2014年厦门聚会时特意为此事向我道了歉，我表示此事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我从来没追究过，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

当然我们也进行了抗争，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6·20”当天下午我们就到北京新市委告状，但新市委完全站在工作组一边，说工作组是新市委派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与孙有余的讲话如出一辙。我们只能无功而退。但内心很不服气，就又到“红旗”杂志社告状。“红旗”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与北京新市委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说：工作组就是工作组，新市委是新市委，党中央是党中央，不能混为一谈。对工作组有意见，贴大字报是你们的权利，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还给我们引见了林杰，林杰也明确表示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当时还认为自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是这个信念让我们坚持了下来。到后来才知道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是毛泽东给他设下的一个圈套。但是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我们当时给工作组贴大字报到底是对还是错？

“6·20”当天《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了。我们要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这个运动。要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让群众把意见充分地讲出来，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一个个地砸得粉碎。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革命的大字报好得很！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一下子就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露出了真面貌。革命的大字报，提出各种样的意见，揭露各种各样的矛盾。

我们是根据当时的中央精神给工作组贴了一张大字报，并且语言很温和，工作组就凭此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绝对是错误的。说起来有两件事很可笑。一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事与上层有什么牵连，我还通过我的清华同学找到了刘涛（刘少奇女儿），让她把我们的申诉材料交到刘少奇手中。用现在的话叫踢了一个“乌龙球”——自找死路。二是在7月1日，我们三人中无一个党员，我与武世文连团员都不是，还搞了个向党宣誓，实际上是在找一种精神寄托。现在可以说真相基本清楚，我感到自己受了毛泽东的欺骗，当然

毛泽东不是欺骗了我一个人，而是欺骗了全国人民。

美国前总统有句名言：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本来面目被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总有一天他会被彻底请下神坛，他的罪行一定会得到清算。

在这26天中，我们多次到“红旗”杂志社上访，每次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那次物理楼110被批斗后，我一人逃出校门找林杰投诉，林杰也问得很详细。到要离开“红旗”回校时已是凌晨二点左右了，林杰问我：现在已没公交车，你怎么回学校去？我说：那就走回去。林杰说：隔壁有个老大姐（我一共见过她三次）是个老革命，年龄这么大了，还在斗争，还在革命。我去问她一下，能否把你捎到学校去。

在回校的路上，这位老大姐也详细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当我说到我们到北京新市委上访遭到冷遇时，她插话说，你们找错地方了。当时我愣了一下，不知她说的什么意思。车到小西天离北师大还有一站路时，她说为了安全，你就在这儿下车吧。就是这次回宿舍时，同宿舍的人搞了个恶作剧：把扫帚与畚箕放在门框上，待我推门而入时，扫帚与畚箕砸在我的身上。

第二次见到这位老大姐大概在7月12日左右。那时工作组对我们不断升级，最后把我们三人分别安排住在西南楼301、303、305，也就是将我们隔离了，我们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连上厕所时后面都有两同学跟着。全班分成三组，逼我们写交待材料。我们组的人说：你还这么顽固，他们两个早交待了，他们把你出卖了，你不要再这么死心塌地了，不要再为李庆林卖命了。在这种攻心战术下，我也有点动摇。心想写就写吧，到“红旗”告状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于是我开始写材料，主要是写过程，仍然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一天晚上，同宿舍的人威胁我说，上面有人把李庆林找去了，你就准备被抓进去吧。我听后觉得是上面派人来调查了，感到有救了。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到校工作组设在中北楼的办公室，身后有两同学紧跟着。我也不知道李庆林在哪个房间（原是学生宿舍楼），

随便推开一房间门，正巧看到李庆林在里面，而找李庆林的正是那晚送我回校的女同志。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抬起头来看到了我，也看到了我的盯梢，她认出了我，对我说：你先回去，以后再找你。

第三次见到她是在7月16日。那天下午约四点左右，突然有好几辆轿车开进了北师大，那时对我们的监视稍放松了一点，我正好在新二教室边的路上，当轿车驰过我身旁时，我无意识地往车内看了一下，看到车内就是那晚送我回校的老大姐，她正好抬头也看到了我，并对我微笑了一下。就在这晚上，在北饭厅召开了全校大会，会上那位老大姐（此时我才知道她叫曹轶欧，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是康生夫人）与吴德讲了会，宣布孙有余犯了严重错误，撤消他北师大工作组组长职务，勒令他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同时宣布刘卓甫取代孙有余任工作组组长。孙有余成了全国第一个下台的工作组组长。

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文革已领到了圣旨，以工作组镇压群众为名开始反攻了。7月25日、26日中央文革全体人马连续两晚到北京大学撤消了张承先工作组，7月27日又到北师大撤消了刘卓甫工作组。撤工作组的理由是工作组镇压了群众，是文革的绊脚石，号召群众踢开石头闹革命，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彻底闹革命。会上为因贴工作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了反，我也从此获得了彻底的平反。

“六·二〇”事件是北师大标志性事件，在这事件中至少有几百人被打成“反革命”，他们后来的情况我不清楚，应该与我们大同小异。因为校党委垮得快，所以后来的所谓“造反派”与“保守派”实际上是以“反对工作组”还是“保工作组”而划分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目的是要把文革纳入有序的规道，要有领导，要稳，不能乱来。他的做法明显与毛泽东是不一致的，但是刘少奇不能明讲，只能暗抗。下面的群众是不知道上层这种分歧的，如果有敏锐的分析能力是能够感觉到这种细微的差别的，因此就出现了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事。虽然后来林杰、曹轶欧都插手了此事，但是我可以断言，高树奎等同学跟我们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都是自发的，与上层无关。工作组与刘少奇把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是错误的，这是刘少奇的失着，这也导致了刘少奇被说成搞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打倒而退出了政治舞台。当然，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他不派工作组必然会说他放弃领导搞乱全国而倒台。此时的刘少奇已是毛泽东砧板上的肉，只能随毛泽东任意宰割了。

## 二. 谭厚兰

讲北师大文革，身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是绕不过去的人物。谭厚兰是政教系 1961 级（1）班的班长，是个调干生，当时已 29 岁了。文革前被借调到“红旗”杂志社帮忙（大概是做批“海瑞罢官”的资料收集工作）。

1966 年 6 月 1 日，在得到了要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消息后，立即同历史系同在“红旗”的三位同学一起从“红旗”匆匆赶回学校贴了第一张炮轰校党委的大字报，抢了反党委的头功。但是在“6·20”高树奎反工作组大字报贴出后，谭厚兰不仅没有支持高树奎，反而贴大字报支持孙有余的工作组，听说她还参加了支持孙有余工作组的游行。可是仅隔了三天（6 月 23 日），谭厚兰与同班的三位同学又贴了一张大字报，表示重新支持高树奎，反对工作组。谭厚兰因此再次被打成反革命。实际上是她被林杰找去训了一通，经过林杰面授机宜后才反戈一击的。

从此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 北师大的文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群众运动，而是由林杰等人（背后是中央文革）幕后插手与操纵的，所谓“不要保姆”，只是反对工作组与刘少奇的一句托词而已。谭厚兰 6 月 1 日与 6 月 23 日两次贴大字报都是为了捞政治资本，为她登上北师大政治舞台作准备的，她是中央文革安插在北师大的一颗棋子；2. 谭厚兰本人并无多大主见，在这一点上与蒯大富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她一切都听林杰的，离开了林杰她什么都干不了。这也是 1966 年 10 月底井冈山红卫兵内部分裂的根本原因。

由于有靠山，谭厚兰红极一时。在 1966 年 8 月份有一个叫李春秋的教师贴了一张题为“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的大字报，说什么要“恭恭敬敬



地做谭厚兰的小学生“、”要紧跟谭厚兰彻底闹革命“等等，真是荒唐之极。

谭厚兰因为有靠山，所以在许多事上都冲在前面。在1966年11月在戚本禹、林杰（亦说康生）授意下，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她亲自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在曲阜的二十九天，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7年在江青授意下，谭厚兰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学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口号，她是反击“二月逆流”的急先锋，豪称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在67年8月23日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闹剧中，北师大井冈山也是领头羊之一。同年谭厚兰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到处揪军内一小撮，积极参与揪刘火线，反对周总理等活动，影响力极其广泛。与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在院校武斗中起了恶劣作用。

1968年10月，谭厚兰被分配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6月，她被调回北师大作为“五·一六分子”被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据说她交代得比较彻底，认罪态度较好。1981年，谭厚兰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

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纵观谭厚兰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她的最后十多年是在失去人生自由的情况下度过的，也算是一种报应。但说到底她只是毛的马前卒，是只可怜的替罪羊。

### 三. 林杰

林杰虽然不是北师大的人，但是他对北师大文革是举足轻重的。谭厚兰一举一动的背后都受林杰操控，把谭厚兰比作一木偶，林杰为木偶演员最为恰当。

林杰是《红旗》的副主编，关锋是主编。关锋是中央文革成员，林杰便是不是主编的主编。在北大，只要说这是林杰说的，就意味着这是中央文革说的。

谭厚兰第一张反校党委的大字报是从《红旗》赶回北大贴的，谭厚兰“6.23”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也是在林杰的授意下贴出的。在北大，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林杰是中央文革的传声筒，谭厚兰是按林杰的旨意操作的。更应该提到的是1966年7月27日晚上，中央文革倾巢出动光临北大，康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我来介绍一个人，他就是林杰（让他站到台前）。他是你们北大的校友（50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他很关心你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有事可以去找他。（原话记不清楚了，这是大意）事后，林杰曾得意地说：今后我再过问北大文革就师出有名了，是康老让我出面的。从此以后，凡是北大的事，他都要插手，俨然成了北大文革的编外顾问。

北大造反派红卫兵成立于1966年8月23日，当时仅有100多人，所以取名为井冈山战斗团，意为象当年的井冈山一样会发展壮大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中文系五年级的郑云云任团长，谭厚兰任政委。成立当天还在物理楼北门口搞了个宣誓仪式，引来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几乎同时，保守派也成立了红卫兵，因为他们人数多达几千人，所以取名为红卫兵师。但是胜负的决定并不是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谁能紧跟中央文革。大概在九月底

或十月初，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与两报一刊接二连三的社论猛烈攻势下，刘少奇垮了，红卫兵师完全无力招架，只能土崩瓦解了。

面对红卫兵师人多势众，井冈山内部能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但随着红卫兵师偃旗息鼓后，井冈山内部的分歧立即突出出来了。大概在10月初，井冈山搞了一次内部整风，谭厚兰的目的是想把郑云云说成是井冈山内部的赫鲁晓夫，把他从团长的位置上拉下来。但是以郑云云、李庆林为首的许多人在这次整风会上也提了很多意见，而最后的焦点就集中到林杰的身上。理由是中央文革在“7.27”大会上反复强调，今后不再派新的工作组来了，你们不需要保姆，你们要自己解放自己，要踢开石头闹革命。现在井冈山一切都听林杰的，林杰是不是新的保姆？如果林杰错了，我们怎么办？

我觉得这些话有道理，就站在郑云云这一方了。但是支持谭厚兰的人数还是占多数，他们强调林杰后面是中央文革，跟着中央文革是绝对不会错的，就好像进了保险箱一样。两派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闹得不欢而散，只能分道扬镳。

从事后的演变证明，林杰是伸向北师大文革的一只黑手，谭厚兰干的坏事基本上都是按照他的指令执行的，所以说林杰给北师大文革带来的是灾难。紧跟谭厚兰的那些骨干后来几乎都被请进了“5·16”分子学习班就是明证。郑云云、李庆林等能及时地指出要与林杰脱钩的意见是明智的。

#### 四. “十二月黑风”

1966年12月15日，北农大附中学生刘握忠（伊林）、张立才（淦西）以“伊林.淦西”笔名写了一封给“林副主席”的公开信，抄成大字报贴在清华大学。他们是在看到了林彪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后觉得林彪讲话中有些提法不妥而写。伊林、淦西大字报的内容，可以总结为三点。一. 批评林彪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二. 批评林彪要在群众中抓反革命；三. 提出要“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影响

下，12月16日晨北师大同时出现了两封给林彪的公开信。一封是中文系的张传亨（向东彪）与敦进田（林锋）写的，另一封是我们物理系的刘中柱与杨以鸿写的。刘中柱、杨以鸿大字报的标题是：《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两封公开信的主要内容都是批评林彪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刘中柱与杨以鸿在大字报中强调：无论是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角度来分析，事物总是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也是要不发展的。把毛泽东思想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岂不是要窒息毛泽东思想，使其不再有所发展？这两张大字报贴出后，物理系的李文博与数学系的李世取（黑牛）公开表示支持。在北航等院校都有人响应伊林、涤西，因为此事发生在十二月，所以被称为““十二月黑风””。

据我了解，刘中柱、杨以鸿贴林彪大字报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他俩一开始就怀疑文化大革命，都不迷信权威，都希望生活在民主和科学的氛围中。1965年，当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时，他们班正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劳动实习。当读到这篇文章，他们顿生疑窦，这样的文章是科学的吗？恰好他们班孙光启同学的舅舅李大可是中国戏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孙光启和他们一样怀疑这篇文章。由孙光启联系，他们三人拜访了李大可先生。可能由于戏剧研究院已经决定了方针政策，李大可先生表示理解和支持姚文元文章。刘中柱和杨以鸿与李先生辩论了近三个小时，互相说服不了对方。

过一段时间，中文系四年级的金宏达（时汉人）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为吴晗辩护的文章。1966年12月，为躲开学校的嘈杂，刘中柱、杨以鸿、孙光启和李观韶四人到北京教学仪器厂，边劳动边休息。当时刘中柱和杨以鸿对文化大革命已持否定态度，但没有表达的机会。伊林和涤西的《公开信》给了他们机会。当时杨以鸿的观点为，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已是不可接受的，现在又加一个不能动的权威——林副统帅，更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接受毛主席作为绝对权威是迫不得已的，决不能再来一个绝对权威。刘中柱的看法较为实际：中国一定要有民主，民主就会有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不等于反对。如果中国没有民主和科学，将不可能得到发展。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见视作反对，进而视作反革命，这

是不可接受的。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较量一下。本质上他们的大字报就是间接地表达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心声。刘中柱说：至于大字报的对象具体是哪个人，并不重要。那时候对林彪个人，并无特别恶感，只不过认为，他的一些讲话不像话，不像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领袖而已。其他人的情况该与此类同。

刘中柱、杨以鸿的大字报是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写好后带回学校贴出的，贴了后又返回工厂。12 月 17 日凌晨三时，谭厚兰就派手下人把他们两人从工厂揪回学校的小红楼看管起来，同时被看管的还有张传亨和敦进田。当晚就在北饭厅召开了批斗刘中柱、杨以鸿、张传亨、敦进田四人的全校大会。12 月 19 日外语系的董连猛又把他们四人在外语系批斗了一次，随后就把他们四人押送专政机构了。20 日、21 日又相继把李文博和李世取抓走了。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半年之久，备受折磨。放回校后又被实行“群众专政”，强制在校修建队进行劳动改造，直到 1971 年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才被解除劳改。

虽然此事的涉及面较小，但是是冲着林彪去的，其震动是相当大的。众所周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他的地位一下子上升为第二位，排在了周总理前面，成了毛泽东唯一的亲密战友。尽管大字报的作者们使用的语气相当温和，但他们遭到的镇压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它也是北师大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之一。

现在为林彪翻案的呼声很高，我也同意该对林彪作出全面评价，不能一棍子打死。但是林彪肉麻地吹捧毛，说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等等，把毛泽东推到了至高无上的高度，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在文革中林彪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至于后来他与毛泽东及“四人帮”之间的斗争到底是权力之争还是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斗争，我因缺乏资料无法判断。但不管怎么样，在林彪位高权重的 66 年，像伊林、涤西、刘中柱、杨以鸿等对他提出质疑是面临极大风险的，是无私无畏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 五. 井冈山造反兵团

井冈山内部的整风导致了分裂。初期的井冈山红卫兵因强调是造反派，又要注意家庭成份与社会关系，所以人数不多。产生意见分歧后更显得力量薄弱。于是谭厚兰就搞了个“井冈山公社”，吸收了许多人，包括从红卫兵师退出来的绝大部分人。这样她就一下子扩大了队伍，变得人强马壮，在北师大占绝对优势。

没多久，原井冈山红卫兵的少数派就分裂出来成立了一个“井冈山造反兵团”，总负责人是李庆林。具体哪天成立我已记不清楚了，好像是在67年春节前后。因为1966年12月底我串联到重庆中樑山煤矿，突然接到家信说我母亲身体不好，我急着赶回家，直到过了春节后才返校，回校后发现已有了井冈山公社、造反兵团和军训团。我回校后发了个声明，不承认井冈山公社，从井冈山退了出来。但也没加入造反兵团，成了散兵游勇。也搞不清什么时候来了个军训团，来了以后重点就是找李庆林他们，说他们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夺谭厚兰的权。在高压下李庆林他们只能解散造反兵团。这次的造反兵团是短命的，可能不满两个月。如果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应该能找到关于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解散的报导《在北师大的军训团是如何支持左派的？》及配发的社论。

兵团解散以后，李庆林基本上不活动了，但王颂平等一部分同学仍不甘心，继续开展地下活动。到王力、关锋、林杰相继倒台后于1967年9月7日宣布恢复活动。我从内心是支持他们的，在他们最困难时公开加入了造反兵团，成了一名兵团战士。但因对他们提的一些口号感到有点太极端，对他们经常冲击会场的做法不认同，所以没参加过兵团的具体活动，只是一名挂名的团丁。

总的来说，我认为造反兵团与林杰脱钩是正确的，兵团的头头不是“一小撮坏头头”，而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敢于掀起“倒谢（富治）”是值得敬佩的。在谭厚兰“围攻工五楼”时没有投降也该肯定。在当时，造反兵团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完全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但自始至终没得到上层的承认与支持，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能坚持下来是很

不容易的。但是他们不能顺势而为，没有在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及时解散造反兵团，成为全国最后的群众组织，导致了在1971年4月26日被被军、工宣队“一锅端”（被押送到怀柔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也不清楚抓他们的罪名是什么？最后怎么又放了他们，给他们的最后结论是什么？所有这些可能都是一笔糊涂账。

## 六. “九·七”事件

“九·七事件”是北师大文革中特大的转折性事件，详细过程大致如下：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百万雄师”为了要求中央承认他们为革命群众组织扣押了王力，后来在总理干预下，王力才被安全接回北京。7月25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援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百万人大会，王力作为英雄受万人瞻目。可是仅隔了一个多月，到八月底就传出了王力、关锋、林杰相继倒台信息。据说原因是两条：1.王力在8月7日发表了著名的“王八·七讲话”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要夺外交部的权；2.8月1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然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这“八·一社论”就是关锋起草、林杰执笔定稿的。

就在8月26日，毛泽东做出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令他们“请假检讨”，令戚本禹停职检查。林杰跟着王、关一起进了班房。戚本禹是1968年春彻底下台被送进秦城监狱的。

王力、关锋、林杰倒台的消息立即轰动了北师大。有关王、关、林的大字报大量涌现。此时的谭厚兰慌了阵脚，好像热锅上蚂蚁，不知所措。由于利益所趋，竟然在9月1日晚上，还召开了一次保林杰的表忠心全校大会。在会上，谭厚兰声嘶力竭地叫嚷：现在校内

出现了大量反对王力、关锋、林杰的大字报，这是炮打中央文革的，是反革命逆流。林杰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他坚定地支持我们井冈山，他与我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说到此处竟然声泪俱下。谭厚兰甚至还派革委会副主任董连猛率大队人马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以示声援林杰。

但是北师大的形势决不是你谭厚兰几滴眼泪所能扭转的。被压垮的造反兵团决定在9月7日恢复活动。更没想到的是谭厚兰的后院起火了。以北师大革委会常委樊立耀、黄家林、李五全为首的井冈山公社的内部对立派捷足先登，于9月6日晚上抢先把谭厚兰抓了起来，在9月7日上午约七点多，樊立耀等人在大操场宣布了这一消息，同时宣布成立了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专谭厚兰政的“专政委员会”，主要成员是樊、黄、李等一些校革委会的委员再加上李庆林与即将恢复的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几个头头。樊立耀等人还让郑秀梅（谭厚兰同班同学，6月23日谭厚兰大字报签名者之一，谭厚兰的秘书）上台揭发谭厚兰，郑的发言中还暗示了谭厚兰与林杰有不正当关系。

虽然我对谭厚兰是反对的，但对用这种方式把她抓起来觉得有些不妥，于是就去找李庆林问个究竟。约十多分钟后我在物理楼碰到了李庆林，我问他：你进“专政委员会”的事知道吗？这么大的事怎么连招呼也不给我打一声？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的话我就去说明你不知道，不承认此事。李庆林表示同意。当我赶往大操场主席台时，正遇上造反兵团宣布恢复，随即浦寿章（可能是别人，记不清了。）表示造反兵团与“专政委员会”无关，我当即抢下浦寿章的话筒，说李庆林也不知道“专政委员会”的事，不参加这个“专政委员会”。

因为是抓谭厚兰与造反兵团两件大事的迭加，北京“天派”的各大组织像潮水般地涌进了北师大，蒯大富、韩爱晶等著名人物也亲临北师大助阵（也有人说他俩躲在北京电影学院幕后指挥）。但是到了傍晚七点左右，形势急转直下，在不到半小时内连续来了下列三道命令。此消息刚宣布，北京“地派”的人就纷纷到北师大游行声援谭厚兰。9月7日一整天，上午“天派”、晚上“地派”到达北师大的人数高达10万人次。



### 中央文革紧急通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反对开群众大会斗谭厚兰，反对搞垮师大革命委员会，谭厚兰和师大革命派在二、三月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一行动。你们应当立即释放谭厚兰同志。希望你们严格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提革命警惕性。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接谢副总理转达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叫我来传达如下指示：

1. 北师大的革命委员会、“井冈山”是革命的组织。谭厚兰是革命的，如有错误以进行批评与检讨。
2. 不能搞垮革命委员会与“井冈山”的革命组织，不准揪斗谭厚兰，不能限制她

的自由。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是错误的。凡属于被抄的一切公私物品一律归还。

以上指示由原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鍾奇同志 9月7日晚传达

### 通 告

一、北京师范大学，今天在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下，擅自推翻师大的革命委员会，非法绑架和斗争谭厚兰与师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些作法都是完全违反中央“六六”通令，完全违反中央负责同志最近的讲话精神的，现宣布无效，并立即恢复原来的师大革命委员会的一切权力。

二、樊立跃等人自己组织的专政委员会是非法的，应立即宣布解散。

三、樊立跃、黄家林、李五全三人拘留审查。

此命令通报全市各革命组织。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对于“九·七事件”，我的看法是：

1. 此事件是惊动了最高层的，之所以保了谭厚兰并不是说她没问题，而是她占了革委会这块招牌的光。上层是怕别人仿效，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新生的革委会相继垮台。虽然谭厚兰暂时稳住了阵脚，后来还搞了武斗，对造反兵团占据的“工五楼”断电、断水，最后极其疯狂地“围攻工五楼”，但是掩盖不了她色厉内荏的本质。我认为从“九·七事件”开始，她的威信在北师大直线下降，从此走上了下坡路，所以我认为“九·七事件”

是北师大的转折性事件。谭厚兰宣称与林杰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这是不打自招地承认与林杰上了同一条贼船。现在林杰倒台了，那上了林杰贼船的谭厚兰一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

2. 井冈山造反兵团当场宣布与“专政委员会”无关，我也代表李庆林当场宣布李庆林不参加“专政委员会”。这足以证明造反兵团和李庆林没有参与樊、黄、李等人抓谭厚兰的幕后策划，与“专政委员会”没有任何牵连。也就是说造反兵团恢复与“九·七事件”是毫无关联的两回事。

3. 对于樊、黄、李等人为什么要抢先抓谭厚兰我并不清楚。他们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抓谭厚兰是错误的，没征得本人同意就将其塞入“专政委员会”的做法是错误的。但要说他们犯了什么弥天大罪，我认为也不恰当。他们的行动只是过急了一些，到了1970年6月谭厚兰不是被军、工宣队押回学校办“5·16分子学习班”吗？需要追查的问题都是“九·七事件”前所犯的事。“四人帮”倒台后，在1978年4月谭厚兰不是仍被抓吗？要不是她身患绝症，照样会判她十多年徒刑的。

## 七. 工作组、军训团、军宣队与工宣队

在北师大文革史上，上级一共派了四支队伍：工作组、军训团、军宣队与工宣队（以下简称为工宣队）来领导过北师大文革。工作组是从1966年6月6日到7月27日，军训团与工宣队进校、离校时间不详。军训团是在1967年初进校，何时离校不清楚。工宣队是1968年8月初进校，直到我们1972年4月底离校时还没走。

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因镇压反对工作组的群众，被说成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革的绊脚石，被称为保姆，最终被赶出了学校。军训团可能是毛泽东派的，工宣队肯定是毛泽东派的，这两者都是体面地离开北师大的。但是从实质上来讲，军训团与工作组同样是保姆，所以说驱赶工作组的理由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

工作组把对他们提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至今我仍然认为是错误的。军训团还算温和，但他们仍然采用了压服的办法解散了造反兵团，是支一派压一派。工宣队办了大量的“5·16分子学习班”，最终连谭厚兰都没有定为“5·16分子”，那她下面的那些骨干更定不了，所以绝对是打击了一大片。

在这期间，井冈山的作战部副部长王瑞龙(数学系)对抗工宣队，跳楼没死但摔断了腿，后来开全校大会进行批判，并当场作为抗拒典型逮捕法办，不知他何时被释放，最后是如何定性的。同是数学系的李竞权，乘到北医三院看病时(有人押送)，从医院的楼上(听说是头朝下)跳下当场死亡。又把不听话的造反兵团头头与骨干以及部分《大海航行靠舵手》头头与骨干(造反兵团的同情者)(具体人数不清楚，至少几十人，可能接近100人)押送到怀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我看来，这些上级派下来的领导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唯上是命，是执行上级领导指示的工具。只要听他们的话就可平安无事，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会遭到反感，严重的会遭到镇压。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工宣队办的最后一件事是毕业分配。我们69、70两届学生应是在1970年7月分配，但因抓“5·16分子”而延期分配，一直到1972年4月才分配。我们64级学生虽然只念了两年书，但却在学校呆了八年，整整一个抗战，大家戏称是研究生毕业。当时分配的原则是四个面向(工厂、农村、基层、边疆)，所以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基本上无名额。有人从分配结果总结出来的规律是：成对的边、远、差；单吊的做填充；已婚的就近解决。这在当时也算无可非议。但因66、67、68三届统统扫地出门(无一人留校)，所以北师大出现了教师无人接班的窘境，故在我们两届分配时出现了部分留校名额。别的系我不清楚，估计也与我系类同，我系69、70两届共有10多人留校。按理来说，留校是当教师的，应该留学习成绩好的，但是我年级却留了一个最差的。此人“大一”时是全年级唯一的“普通物理”红灯高挂者，据说后来因无法胜任教学任务自动调离北师大了。而物二(5)班的王正志是一致公认的佼佼者，却分到了辽宁丹东东沟公社中学。

为了把问题讲透，我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王正志。她是北师大女附中毕业的，高一时

参加北京市高二的数学竞赛获二等奖，于时跳了一级直接读高三，第二年参加北京市高三数学竞赛时又一次获得二等奖。毛泽东在1964年举行过一次春节座谈会，邓小平插话说：我女儿有个同学跳了一级，成绩还是名列前茅，我看应该允许跳级么。说的就是王正志。她1964年高考时是全国理科第三名（当时是全国统考），她的第一志愿是清华。清华录取她后发现其父母都是右派，只能把她吐了出来。后来女附中领导出面要求师大收下她才进了北师大物理系。在文革运动中，她是同情造反兵团的，结果也被押送到怀柔去。她1978年以特别突出的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天体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两年后拿到硕士学位，留所工作。1984年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就代表美国出席了国际天文学会南京会议。还获得过全美有色人技术全能明星奖。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在国内被当棵草，在美国却被当作了宝。从这件事上完全可以看出用政治观点录用人是何等的荒谬。

另外一件事也必须带上一笔。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三人都是68届的，应该在1968年12月份毕业分配。因为是“反革命”，当时不给分配，于时就安排到我们年级来了。刘中柱到1班，杨以鸿到我们4班，李文博到5班。我们分配时已是72年4月份，林彪早在71年9月13日就摔死在温都尔汗了。杨以鸿说：我是68届的，到现在刚分配，用人单位一定要问个为什么？我没别的要求，只要求你们把我们当时写的给林彪的公开信放入我的档案就行了。我认为这要求合情合理，可是工宣队就是不同意，还说什么林彪在66年是党中央副主席，你们那时反对他还是错的。真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我估计刘中柱、李文博一定也是同样遭遇。反过来物一（3）蔡鸣乔，因同情兵团被抓到怀柔。从怀柔释放后，大多数同学获得了自由，但他又被宣传队以“怀疑康生”为理由继续单独隔离审查。在毕业分配时，还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写在他的档案中，宣传队负责人白本章说：“给他记一笔，叫他老实一辈子！”由此可见，宣传队对我们学生的政治生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其实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刘中柱后来考进了北师大物理系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引力理

论和复杂系统理论。1990年以来，从事光纤使用孤立子进行通讯的理论研究，研究在改变光纤的参数时，光孤立子可能发生的改变以及对于通讯过程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参加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十篇，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同时，研究了具易磁化面的自旋链的朗道—栗夫席兹方程，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这个方程的孤立子解的解析表达式。这个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同时还发表与此有关的论文四篇。后来又从事毫微米距离的引力—Casimir力的研究，发表论文两篇。从事声致发光现象的理论研究，在《物理化学杂志》等杂志发表论文两篇。并从事有关检验光子静止质量实验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物理评论》等杂志发表有关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被放大，以及交通堵塞问题等复杂系统性质的研究论文十篇，全部为SCI收录论文。

杨以鸿 1980 年考取首届 OUSPEA，1984 年以优异成绩在犹太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但他谢绝了美方高薪聘用重回北师大任教。但因他在文革中长期遭受打压，经常借酒浇愁伤及肝脏，并于 1987 年身患肝癌，经多方治疗无效，不幸于 1988 年 2 月 3 日午夜逝世，终年 41 岁，英年早逝。为了纪念杨以鸿，北师大 1988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师大周报》用整整四个版面以“专号”的形式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详细介绍了杨以鸿不平凡的一生。

对李文博后来的情况了解不太详细，但可以肯定地说也是非同一般。后来他在北京交通大学（原北京铁道学院）任教，是研究生导师，我班一同学的女儿就是他带的研究生。我班有一同学在深夜跟他打电话，他却不在家里而是还在实验室做实验。遗憾的是李文博已在 2006 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可以设想，如果林彪不是惨死，“四人帮”不打倒，王正志、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等一定是永无出头之日，整个中国仍然是漆黑一团。

## 八. 北师大文革的暴力及其造成的危害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现在就看看北师大是

怎么横扫的吧。党委书记程今吾被迫害致死，跳楼自杀的有教育系的石盘、马特，物理系的祈开智等教授。教我们“普通物理”的赵亮坚副教授上课无一句废话，每堂课一气呵成堪称完美，深受学生欢迎。他的夫人王蓉老师是物理系办公室主任，办事干练泼辣，广受好评。但因赵老师毕业于辅仁大学物理系，与王光美是同学而被怀疑为特务，他们夫妇俩于1968年4月8日双双触电自杀。中文系学生张瑞棣在主楼七楼摔下而亡，原因不详。（其同学与家人怀疑被对立面从背后推下），数学系学生李竟权跳楼身亡。全校这类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详细统计数字，估计在50—100人之间。

外系的情况我不清楚，物理系何秀琴、金永龄等系领导被打倒批臭，物三的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因在66年12月给林彪贴大字报被抓，物二（3）班的许永康因言获罪被送进总务科劳改队。我们班总共才25人，前后至少有5人次（武世文一人两次）被打成“反革命”、“5·16分子”等。其中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押送怀柔专政。杨以鸿是68届的，本应在1968年12月分配，就是因为是“反革命”不给分配，转到我们班来了。因此我班的人数也可认为是26人，那么当过反革命的比例高达20%以上。我班是重灾区，如果平均以10%计算，那全校师生员工中被打成各类牛鬼蛇神和反革命的人数不下1000人。

应该承认，大学生比中学生要理性一些，像女附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的事没发生过，但惨不忍睹的事也是层出不穷。让老干部与教授们戴高帽子、游街，批斗他们时搞喷气式等是应有尽有，一项不缺。有些同学可能是为了表示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在批斗会上的行为让人至今心有余悸。例如物一的岳××与刘××在批斗物理系党总支副书记吴碧华时多次猛揪吴碧华的头发不松手，好像对她怀有刻骨的深仇大恨似的。在批斗彭德怀元帅时，让早与他离婚的浦安修（北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陪斗，让彭德怀示众时，因他是光头无头发可揪，干脆拎着他的两个耳朵让其示众。我也搞不清当时的押解者是怎么想的，也许他们认为彭德怀反对毛泽东，应该千刀万剐。但我认为，他们肯定也知道毛泽东曾写过“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也知道彭德怀是开国功臣；在十大元帅中排行第二；也知道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我真“佩服”他们真能

下得了手。北师大批斗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时大概在九月份，北京的气温还较高，但他们都穿着棉裤，据说是因为长期跪着批斗导致膝盖溃烂。罗瑞卿因不堪受辱，曾以死抗争跳楼自杀未遂时摔断了腿，但还是不放过他，他是被用箩筐抬上台的。真残酷，真悲惨！

从1966年6月1日开始，全校基本上停课搞运动，连校办工厂的工人也停工不生产。这方面造成的损失虽然是无形的，但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的损失是精神方面的。造反兵团虽然只有100多人，但是他们的同情者与支持者是大量的，几乎占到全校人数的50%，每个单位都分裂成对立的两派。我班只有25人，文革前只有极少数同学之间有点意见，但都属正常范围内。但是文革中就分成对立的两派，互相之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1972年毕业分配时全班没留下一张合影，同窗八年分别时互相不留地址，不知对方分在何处，甚至连告别一声都没有。导致了1999年“毕业30年聚会”时部分同学根本没接到通知，2002年“百年校庆”时返校人数才增到50%以上。直到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聚会”时才把25人找齐，2014年我班又在厦门搞了一次“入学50年聚会”，通过这几次聚会，大家才消除隔阂，重新融合在一起了。但是最近又因对毛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上观点相悖，重新出现了分裂迹象，我班的微信群已“一分为二”。我认为政治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沟通，如果不能统一也无所谓，求同存异就是了。从现在的情况看，几次聚会的努力又将付之东流了。

一个班级、一个学校是全国的缩影。全国范围内，文革中因政治观点不同导致亲友断交、父子反目，夫妻离婚的事比比皆是，整个社会好像被撕裂了。大学不招生，中小学只学毛语录，文教、科技、卫生都雪上加霜，整整耽误了一代人。中共前退休部级官员、现任中山大学教授于幼军最近在首个“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系列讲座中说：据不完全统计，230万中共官员被“立案审查”，约占“文革”前全国官员总数1200万人的17.2%。近3万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官员被“审查”，占部委官员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

害。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 5,000 亿元，相当于中共建政后 30 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 80%，超过 30 年中共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几乎没有增长。如 1966 年人均粮食 379 斤，食油 3.5 斤，猪肉 14 斤，1976 年依次分别为 381 斤（只多了两斤），3.2 斤（下降 0.2 斤），14.4 斤（上升 0.4 斤）。

于幼军还说：从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10 月，长达 10 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不仅迫害死了无数无辜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群众，而且中共各级官员也难逃其难，包括上至中共国家主席，下至中共普通官员很多也惨遭迫害致死。

据叶剑英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 2,000 万人，1 亿人被迫害，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 8,000 亿元。此外，文革还使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其负面影响，恐怕几代人也难以消除。

但是，上至刘少奇下到平民百姓非正常死亡到底死了多少人？国民经济损失了多少？官方至今仍无确切数字公布。是无法统计还是统计了不敢公布？

## 九. 红卫兵

1966 年初，清华附中、北大附中首先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代表人物是清华附中的骆小海、王铭、卜大华与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没多久，红卫兵就在北京各中学蔓延开来。6 月 24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来又写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与《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在《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中，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骆小海等把“前二论”交给了江青，请江青转交给毛泽东。毛看后给予高度评价，在给他们的回信中反复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强调“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



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8月1日后，北航、清华等大学里的高干子弟们抢先成立红卫兵，但影响不大。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把红卫兵的袖章套在了毛泽东的衣袖上，毛泽东成了名符其实的红卫兵的红司令。从此以后各大学的红卫兵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起来了。造反派成立红卫兵，保守派也成立红卫兵。就像北师大的井冈山红卫兵战斗团与红卫兵师一样。反正既不需要注册、登记，也不需要什么人批准，只要观点相同的，贴个成立宣言，买个红袖章往衣袖上一套就大事告成了。后来工人、农民与各行各业纷纷成立“工人造反派”、“农民造反派”等等，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红袖章，实际上也是红卫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专政对象”、“黑五类子女”、老人、小孩等一部分人以外，几乎达到了“全民皆兵（红卫兵）”的程度。“红卫兵”三字后来演变成“文革过来人”的代名词。最近看到北大钱理群教授的文章，把上一任与当今当政者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都划入了红卫兵队伍中。

众所周知，文革中红卫兵犯了许多错误。打死人、扫四旧、批斗老干部、老教授、参与武斗等等都是红卫兵干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样笼统地说有失公允。参与上述活动的人数是很多，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只是红卫兵中的少部分人，并不是全体，并且里面有不少高干子弟活跃在其中。

例如：北师大女附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就是以高一（3）一帮高干子女为主体的学生所为；北京大兴县屠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事也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所谋。而这类高干子女因有丹书铁券罩着，不仅没受到任何惩罚，却还步步高升，薄熙来是已经倒台的一个特例，还有不少人成了现在的党、政、军的高官。

但是还应该看到，这些事实际上是得到上层的支持与默许的。干坏事的人当然难辞其咎。全国各地类似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人物，绝大多数被判了刑，但奇怪的是发动文革的人不仅不承担责任，而且还被当作伟大领袖继续歌颂，且大有重返神坛之势。

从大学的红卫兵来看，大部分人没有参与打死人等极端行为的事。多数人除了参与斗

本校的老干部、老教授外，最大的精力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卷入了上层的内斗中了。绝大部分人是认真分析研究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等首长的讲话，不断地寻找下一个猎物。盲目地跟着今天炮轰×××，明天打倒×××。但也不乏头脑清醒者，所以才会出现“炮打张春桥”、“打倒谢富治”等壮举。到了中、后期，许多人已不再紧跟中央文革而作壁上观，有的已暗暗地与中央文革较上了劲。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十里长街百万人冒着严寒为周总理送行、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便是明证。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时，个个眉开眼笑、弹冠相庆印证了人心所向。

现在的电影、电视，几百年前的宫庭大戏一部接一部，那些违背历史的抗战神剧、并非正义的谍战、内战更是连篇累牍。但无一部专谈不到半世纪的文革片，似乎文革在中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是涉及也是公式化：红卫兵在搞打砸抢，在批斗老干部、批斗老教授。它们似乎在告诉人们，文革是红卫兵搞的，红卫兵是文革的罪魁祸首。

我对此极为反感。虽然中央有文件，承认文革是十年浩劫，但奇怪的是却不让大家分析文革产生的原因，研究防止再次发生文革的措施。现在有人说，毛主席是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犯了错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认为：全中国有良知的人都会认定，文革的罪魁祸首非红司令莫属。真不明白当局者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对此讳莫如深？■

2015.12.19 于上海

【评论】

## 如果她还活着

——话说北师大井冈山头头谭厚兰

七尺从天

文革中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都有了传记或回忆录。韩爱晶也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写到了《清华蒯大富》之中。谭厚兰 1937 年生人，文革时二十九岁，如果她还活着，今年也该七十九岁了。以她那争强好胜的性格，她肯定也会述往事，思来者，做口述、受采访；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吧？退一万步说，即使她不述不写，媒体也不会放过她。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海内媒体可以装聋做哑，海外可是不听招呼的。如果谭厚兰还在世，相信她会成为记者的香饽饽，在阳光卫视，凤凰大讲堂上大展风采。

一

有压迫就有反抗，“五大领袖”走上造反之路，都是因为受压。但具体情况不同。

聂元梓是 21 年出生的十二级干部，出生在河南滑县南尖庄的一个开明士绅之家。16 岁参加革命，17 岁入党。中共建政后，担任过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60 年调入北大，任经济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1964 年下半年，中宣部的工作组来到北大开展“社教运动”。工作组号召给北大校长陆平提意见。聂和北大的部分教师干部积极响应，除了说陆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外，还说他不抓阶级斗争。没承想，上边保陆平，说他是好同志。认为北大工作组搞错了，撤了这个工作组。而新来的工作组在国际饭店开会，磨刀霍霍准备收拾提意见的人。面临着被踢出北大，流放怀柔的命运，聂跟她的同事们乘着毛的发动，背水一战。于是才有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蒯大富 45 年出生，江苏盐城滨海县振东乡，父母都是四十年代中期入党的农村干部。文革时是个清华学生，因为好出风头，好虚荣，为班里同学所不喜，到了三年级也没入上党。<sup>1</sup>他的造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某日，工作组告诉他们班，王光美要来看他们。结果王光美没来，来的是一个崔姓的女士。蒯找工作组理论，工作组不承认说过这话。事实上，工作组确实说过王光美要来看同学，后来王光美改了计划。就这么个鸡毛蒜皮大的事情，工作组就不敢说真话。一定要替王光美兜着。这是中共等级制度长期形成的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上级领导一切都是正确的完美的，他们不会，也不能出纰漏，更不可能犯错误，即使临时改变计划这类在情理之中的小事，也不能实话实说，而一定要坚持是你们听错了。王光美压根就没打算来。如果换了别的学生，吵一吵闹一闹也就算了。这个鸡毛蒜皮的事偏偏碰上了热爱出风头又混不吝的蒯大富。蒯死纠缠打，并且娴熟地运用了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时代传统，指责工作组搞了阴谋，设了骗局。力量悬殊的甲乙两方（蒯代表对此事有疑问的一方，工作组代表权力的一方）在大礼堂辩论。丧失了纠错能力，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工作组，面对着蒯大富的大胆提问和机智对答，乱了方寸，除了上台摆摆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资格外，就是以势压人。最后，让蒯大富占了上风，工作组数千名看热闹的清华学生的哄笑中灰溜溜下台。工作组气极败坏，按照反右模式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蒯以绝食抗争。就在这时候，喜讯传来。工作组挨了毛的批评，执行了资反路线。蒯大富从此翻身，成了清华第一号造反人物。

王大宾 41 年生人，是个来自四川西昌地区德昌县大山里的穷孩子。文革时，他是地质学院探矿系的学生干部（团支书）。他参加造反是出于正义感——文革前，他们班上有一个两次留级的农村学生张树声，按规定他得退学回家。王大宾深知这个决定将毁掉张的一生。于是和班长陈世斌一起去找地质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的高元贵，替张同学说情。“高院长稍做考虑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以激将法和我们订下君子协议，要我们保证张树声同学能迎头赶上，决不会再留级。我们履行了承诺……张树声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成为

<sup>1</sup> 唐伟：《蒯大富其人其事》，已删的网文。

一方面的骨干。”<sup>1</sup> 高元贵对这件事的处理，让王大宾深受感动：“高院长是对穷人家的子弟有阶级感情的，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学路线的。”“高院长是个好干部好院长”。然而，工作组一进地院，就把高元贵定为重点打击目标。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高元贵的“三大罪”，撤了他的职。<sup>2</sup>为高书记抱打不平，再加上对工作组其它方面的意见，王大宾走上了造反之路。

韩爱晶 45 年生人，出身于“江苏省涟水县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生父早年参加革命，不幸牺牲。继父是一个中层干部，怀着抚育烈士遗孤成人的责任感，对韩爱晶要求严格而不失疼爱；但韩爱晶却总感到在家庭里难以寻求到温暖，从小养成了孤僻、郁闷的性格，后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关于他投身造反的情况虽然没有详实的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北航学生的造反原因与前三位有所不同。第一，他是同情给工作组提意见的石国新、戴维堤等同学而参加造反的；第二，他在北航学生到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 28 个昼夜中，他表现得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sup>3</sup>顺便说一句，在“五大领袖”中，韩爱晶是最富观察力，最长于思考的人。正是这种好学深思的品质，使他在反思历史，总结文革时，写出《清华蒯大富》这样的厚积薄发的著作。

最后，该说说本文的主角谭厚兰了。谭 37 年出生，“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 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sup>4</sup>文革时是北师大政教系的调干生。<sup>5</sup> 这个二十九岁的女性有闯劲而没主见。如果说，她的闯劲来自性格，那么，

<sup>1</sup> 王大宾：《王大宾回忆录》第 7 页，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 年。

<sup>2</sup> 出处同上，何长工给高元贵定的三大罪，一是非常高傲，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二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三是忠实执行了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见《王大宾回忆录》第 8 页。

<sup>3</sup> 韩爱晶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Te5MsuhJWSMqko6OTmAw3DyCS97eoNH02IeGO-SOV0XIK4VLvA9tej1jypcpP1lxTi8L2dktxEiDEZl00itTa>（2016-2-27 检索）

<sup>4</sup> 谭厚兰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DcKwzCfczFFOLcHVyxHzF1ydP300pIPM9uEoOCTvSgdhFqK92UW4rzh-Zbb22OJ9UA2zQSEISX4AIqvx7HojWK>（2016-2-27 检索）

<sup>5</sup> 从 1953 年开始，凡国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以及解放军系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调派学习或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报考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都称调干生。调干生有带薪的和不带薪两种，保送的带薪，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的不带薪。调干生上学的保送条件是本人出身好、表现好、领导信任。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4Q9IIRgJzsj4tPiHXq9ho3m6pUujUVsOpqQ6o6xk559P39c4CXV4I\\_IKqpMYaRTHC6CrLchAX-mnT01yP0\\_](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4Q9IIRgJzsj4tPiHXq9ho3m6pUujUVsOpqQ6o6xk559P39c4CXV4I_IKqpMYaRTHC6CrLchAX-mnT01yP0_)（2016-2-28 检索）

她的主见则来自林杰。因此，与上面四人不同，她走上造反是被动的，跟林杰跑的结果。

文革前，谭厚兰到《红旗》实习，与副主编林杰相识相知，热衷于政治的她，知道林杰上面有中央文革，从此对林言听计从，成了林杰的死党。在林杰指使下，她第一个贴了校党委的大字报，虽然当了几天“反革命”，却从此捞到了政治资本。工作组进校，学生们反工作组。她起初站在工作组一边，批这些同学。经林杰的指点，她很快调转枪口，支持那些同学，向工作组开火。按照林杰的指示，她在北师大拉起了造反队伍，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按照林杰的指示，她成了“打倒谭震林”，“反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可以说，她所有的主意都是来自林杰，来自林杰上面的中央文革。她是“五大领袖”中最听中央文革的人。赵惠中先生说：“谭厚兰一举一动的背后都受林杰操控。”“谭厚兰干的坏事基本上都是按照他的指令执行的。”诚哉斯言！

有一部儿童动画片，其中有两个主角，一个是“没头脑”，一个是“不高兴”。谭厚兰一身二任，干革命而没头脑，反林杰就不高兴。1967年9月1日，谭厚兰在保林杰的会上说过：“从一年来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革命的大风浪中我们认为林杰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信得过他。”如果说，江青是毛的一只狗；那么，谭厚兰则是林杰的一条狗。林杰倒了，她也跟着倒台。1967年9月7日，北师大井冈山内讧，她被专政，中央连下三道金牌保她。其实，毛哪里是保一个小小的谭厚兰，而是保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

## 二

谭厚兰1982年死于癌症，享年四十五岁。在她那不长的一生中，最值得说的一件事，就是到曲阜伐孔庙，砸孔府、毁孔林、刨孔坟。无论写回忆录，还是面对媒体，她都不能回避这个话题。而要谈这个话题，她就不能不把她的后台——林杰、戚本禹、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人端出来。当然，这些人也不过是前台的将校，没有毛泽东的默许甚至暗中撺掇，谁也不敢做此大逆不道之事。

谭厚兰等人在曲阜的打砸，发生在1966年11月至12月间（11月9日至12月7日）。北京和当地的造反派联手，在曲阜聚集成千上万的民众，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砸碑毁林，刨坟曝尸，批斗专家学者。如此惊天动地的举动，整天看红卫兵小报和文革快报的毛泽东自然早就知道。毛是有意放手不管，让谭厚兰们折腾。如果事情提前半年或推迟半年，谭厚兰都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她砸孔府的时间正是毛让天下大乱的时间。

1968年7月28日，毛与“五大领袖”谈话时露了底：“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

毛这里说的“过去”指的就是1966年8月至12月这个时间段。毛所说的“武斗”指的是老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打人。毛当时采取的“四不”（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政策，就是以“放手发动群众”之名，有意造成无政府主义的气氛，以便让老兵和谭厚兰一类的造反组织“无法无天”，破坏财物，打人杀人。以便打破原有官僚体制，为下一步揪出刘少奇铺平道路。

这场戏，以老兵草菅人命开头（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北京打死1772人。师大女附中的卞仲耘、大兴县集体屠杀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以谭厚兰等造反组织砸孔庙结尾。完美地实现了导演的计划。

谭厚兰的壮举既是本场戏的压轴戏，也是下一场戏（置刘少奇于死地）的开场白——既然历代帝王的老师的坟墓，国务院保护文物的碑都可以砸可以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更不在话下。此后，谭厚兰、韩爱晶、蒯大富们在中南海南外墙搭起的几百个“揪刘火线”指挥部，无数大喇叭没日没夜地狂叫，喝令刘少奇滚出中南海。看到演员们已经到位，导演满意地离开了北京——以便将来把责任推到小将们身上。

### 三

毛泽东为中国留下了沉重而丰富的遗产，如果说，其政治遗产得到了全面继承，经济

遗产得到了全面颠覆，那么，新时期对其文化遗产的态度则复杂微妙得多。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文化转型——偷偷的继承和悄悄的颠覆。

毛时代的单一文化被多元文化代替，但是，一元统帅多元。毛时代的歌德文化被娱乐文化所取代，但娱乐要服从主旋律。毛思想不提了，但由这一思想哺育的“红色文化”在市场的帮助下死灰复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但是，造成文革的思维方式却移步换形，以新的面貌大量复制，四处蔓延。狂热消散，浮躁纵横；理想褪色，享乐飞腾。

与此同时，对毛文化遗产的颠覆也在悄无声息地进行——革命文化全面消退，传统文化全盘复兴。斗争哲学改成了和谐社会、不折腾。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换成了万物和谐，天人合一。曾几何时，被视为封建遗毒的乡贤礼教，族谱家风，乘着怀旧的东风，旅游的快车，纷至沓来。毛时代的革命道德，被儒家的仁义忠孝所取代。曾几何时，被视为封建糟粕的蒙学读物——三字经、女儿经、弟子规、二十四孝高举振兴国学的旗帜，堂而皇之地走进课堂，走向大众。孔孟重光、儒学复兴。

如果谭厚兰活着，目睹无处不在的孔孟之道，听着无处不在的仁义礼智，忠孝廉耻，想到自己当年的誓言口号，将如何感想？

如果谭厚兰活着，面对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面对曲阜每年的祭孔大典，想到自己当年的“勇毅敢为”，情何以堪？

昔日的光荣成了今天的耻辱，过去的辉煌成了永久的悔恨。跟某些老红卫兵、某些纠察队员、某些造反派头头做的事不一样。她干的事，有目共睹，众所周知，想推也推不掉，想掩盖也掩盖不了。长夜无眠，痛苦会不知疲倦地撕咬着她的心。

谭厚兰是幸运的，她不必为后代担心。

谭厚兰是幸运的，她早早地离开了这个非驴非马的世界。■



【述 往】

## 拿捏旧伤，回首冰霜路

——从被囚到平反

蔡鸣乔

### 一、北师大“4·26事件”

#### 1、我们被抓到了怀柔

1971年4月25日，星期天，半夜时分，师大校园内安谧肃静，人们都已经入睡。忽然，在校园南端的中南楼爆发出猛烈的打砸声，顿时人声鼎沸。我当时住在一楼东头的一间宿舍，被惊醒后开门出来只见楼道灯不亮，在黑暗中许多手电光到处乱晃。校宣传队的人带着数百名军警正从各个房间里往外拖人。楼道里一片混乱。到处是叫骂声、打砸声、手提电扬声器的指挥声。我刚问了一句：“怎么回事？”一名手中拿着一张纸的宣传队员用手电对我一照，大喝一声：“抓走！”顿时上来三名军警，一人揪住头发按头，两人一边一个拧着胳膊往楼道外拖。我本能的挣扎叫喊：“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回答我的是一顿拳打脚踢，当即右眼被打的青紫，腰被踢伤。

在拖到楼外的路上，我被压低着头，只见地下散落着一些衣物、不知谁的一条蓝色衬裤从眼前掠过。从楼里抓出的人被押到中南楼东侧的11楼前，一律低头弯腰喷气式。然后在统一指挥下，不走校门，被押着从11楼西侧、中南楼南侧的校园围墙豁口处拖到校外的学院南路上。学院南路上已经停了十几辆各种汽车，我被押上了一辆大客车，坐在最后一排，身边一边一个军警。与我同一辆车的有十几个同学，和我一样，都是两三个军警押一个。

车在路上走了大约3、4个小时，等到地方时天已经亮了。车队开进一处兵营，下车以

后集中在院子里等待。这时有一同抓来的北京籍学校工友，认出了周围的山势环境，说：“可能是怀柔。”

据说当时抓来的大约有110人左右，后来发现有一些人不在名单上，于是放了一些人回学校。放走一些以后，还有70几人。被抓的大部分是住在中南楼的各系男生，也有一些是从中北楼抓来的女生，还有从家中抓来的学校工友。大部分衣衫不整，有的是从被窝里拖出来的。后来听说还有一些人是4月26日以后抓来的，也有一些陆续放回去的，抓抓放放，在怀柔最后关着的人数大体维持70人左右。

这些人被押到七八个临时监房内，每个房间七八人、十几人不等。没有床，在地上放了一些木板。被抓的人情绪都很激动，纷纷质问为什么抓人，无人理睬，大家决定绝食抗议。这时有几位军人来动员大家进食，同时送来开水，但无人听从劝告吃饭。绝食持续了两、三天。这时开始将我们一个个带离，一部分单独隔离，一部分两三个人关在一间屋里。

## 2、对我宣布隔离审查

我被单独关在一间临时监房内，窗户关着，从外面糊上了报纸，天花板上有一盏小瓦数灯泡，被吊得很高，有一张木板床。门外有两个士兵站岗，要上厕所须敲门，来回由一名士兵押着。从抓到怀柔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没有看到师大宣传队的人出现。开始几天无人理睬，没有放风时间，也没有任何书和报纸可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看着从窗上报纸缝隙里射到墙上的阳光，看着那一丝阳光一点一点地移动。

后来来了三个军队干部，两男一女，一位姓焦的副连长，一位年轻的姓张的男同志和另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也姓张。还有一位带眼镜的50多岁的老头，也姓张，好像是个领导，有时候也来。开始带着我学习，动员平山头、批派性，态度还算和蔼，我也甚是配合。我问他们为什么抓人，他们说：“前两天（4月23日）‘五·一’大清查，你们阻挠破坏大清查。”（那个年代里每到节假日之前，北京市都要到每家每户清查户口，以防阶级敌人破坏，听说4月23日晚清查时有个别宿舍的学生和工宣队的人发生了争吵）。我说：“4

月23日晚，工宣队敲我们宿舍的门，我很快就开门了，工宣队师傅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怎么破坏清查了？”那位年龄大的老军人说：“现在态度顽固的就是你们这些似乎与4.23的事关系不大的人。”

大约到六月下旬，调子慢慢变了，说我有问题，要老实交代。直到7月26日，师大军宣队一个叫雷炳的出现了，才宣布对我“隔离审查”。我说：“不是早就隔离了吗？”雷炳极为凶狠地说：“你的问题很严重，是现行反革命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从这时开始，他们给我换了一间囚室，除了门口有两个战士看守外，窗外还有一个流动哨，日夜监视，晚上不许熄灯。

此后，雷炳平均每星期能来一次，雷炳说：“你们口口声声把自己打扮成反对5·16的英雄，你们自己就是5·16！”我说：“5·16是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集团，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卫周总理。我不是5·16，你不要搅浑水！”雷炳说：“江青同志说了，5·16不仅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也指向中央文革。只要有行动，没参加5·16组织也是5·16！”并且厉声地说：“你老实一点！不老实，把你拉回学校见群众，给你加加温！”他们要我交代所谓怀疑康生（时任中央文革顾问，政治局常委）的问题，后来又上纲要揪反革命小集团，要我供认有纲领、有计划、有黑线，说：“L××都交代了。”我说：“他交代了是他的，我不知道！”七、八两个月一直逼得很凶，白天晚上不让好好睡觉。我对他们说：“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不是什么秘密。在68年宣传队进校时我就把有关情况向工宣队师傅说了，许多同学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要我写交代材料。室内没有桌椅，只给一个马扎，写材料坐在马扎上趴在床沿写。我怀疑康生的问题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写着写着就没得可写了，雷炳就说：“态度不老实，挤牙膏！”我拿定主意，要我瞎编，我编不出来，没那个想象力。再说，别人瞎编，我也瞎编，也对不上茬呀，什么时候是个完？一天天熬着，时间长了，也许他们觉得我这管牙膏挤得差不多了，就不怎么来了。

### 3、我在怀柔“学习班”的“幸福生活”

文革期间从66届到70届的大学生，统称为“老五届”。1968年宣传队进校后，66、67、68届陆续分配离校。本来到1970年最后两届都应当离校，但1970年初却来了一个文件，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暂缓分配，留校搞运动，工资按毕业生发放。北京当时还有外语学院（现外国语大学）也照此办理，为什么单留着这两所院校的两届学生，不得而知。

我被抓到怀柔，心中放不下的是在南方的老母亲，在这之前每月都要按月给她老人家写信寄钱，忽然失去联系，怕她老人家担心。再一个放心不下的是我的恋人、同班同学苗致平，“4.26”那天晚上她回北京的家了，第二天回校后发现我被抓走了一定很着急。后来解放军说你可以写信，但要经过我们审查。我给苗致平写了一个条子，让她替我每月给母亲寄钱，同时代我给她老人家写信。从此经常收到她通过宣传队和“学习班”转来的信、钱和衣物，每当收到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像过节一样幸福！有时候，我也写一个条子让捎给她，因为既不能说案情，又不能说我的处境和心情，条子写得很短也很少，只能反复说我很好的，让她不要担心。

从留存至今的来往书信看，五、六月份她来信内容还比较正常，5月18日、6月14日、6月23日、7月14日她的来信都是告知“你在那里好好学习，我这儿一切都好，你勿念”，“妈妈的钱已经寄去了，我给二嫂（当时我母亲在上海我二嫂处）写了信，家里很好，勿念！”“你需要什么东西，来信告诉我，你走的时候，线裤扔在那里是脏的，我给你洗了。”

七八月份我给她写信很少，她急坏了。其中8月26日、8月28日、8月31连续来了三封信，一个劲地问：“没接到你的来信，你还好吗？”“你箱子里的东西也不知道动没动过，我怕里面的衣物发霉了想拿出来晒一晒。工宣队师傅说我动你的东西必须经过你的允许。”（实际上我的箱子早就被撬了）。“你说要我不要挂念你，这是不可能的！”“国庆节我想给你买块手表，我妈说，钱和工业卷（那时买很多东西须凭工业卷，工业卷数量依据工资数按比例发放）不够先从家里拿。”“盼回信！”“请回信！速回信！”字里行

间委婉地传达着她不离不弃的态度和对我的担忧。

天冷了，她给我送来了棉衣。每次送来衣物等，我本能地要里外翻翻，盼着能有什么没通过检查的消息，这一次自然也细细地翻检一通，仍然没有什么发现。直到第二年我从隔离室中放出来后，才知道她真的在那件棉衣的袖子里缝入了一块小布条，布条上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道：“切记，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乱承认，不要乱上纲。对中央同志是坚信；是有的事不理解、议论过、怀疑过；是专门调查、还是在调查别的事时涉及到。一定要按当时的情况，严格地划清界限。头脑要清醒，不要摇摆，心里有鬼的才心虚。心要放宽，一定要想的远些。”这些书信和这块小布条，我珍藏至今。

9月底以前对我的看管比较紧，到9月底，忽然感到比以前松多了。10月5日，负责我的两位姓张的军人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怀疑康生，主要是因为和谭厚兰对立。认为康生是谭厚兰的后台嘛。”那些天，还可以每天由看守的战士跟着到外面散散步、放会儿风。时间长了，和小战士也混熟了，大概他们也看我不像个“反革命”，干部不在时，也和我聊聊天。有一位胖胖的、时常满头大汗的小战士与我关系甚好，有一天他偷偷地告诉我说：“林彪叛国，摔死在蒙古！”我听后很吃惊，联想到近来“学习班”的形势急转直下，又高兴起来，以为很快就要放了我们了。没想到，11月7日怀柔“学习班”撤销以后，大多数同学都回了班、系，我却被拉回师大继续单独隔离，直到1972年3月8日分配离校之前才获得自由，共计被关押319天。

## 二、“4·26事件”的背景

### 1、宣传队进校初期的师大基本形势

1968年8月，宣传队进驻师大以后，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是哪一派的群众都基本回了班、系，接受宣传队的领导，参加所谓的“斗、批、改”。我本人从1968年秋到1970年初，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在班级活动。

这两年时间，宣传队在师大主抓的大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给我记忆很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有一次，驻我班的工宣队Y师傅对学生说：“物理楼看门的老头我看就是特务！我悄悄地跟在他后面观察过，他那条瘸腿是装的，有人的时候就瘸，没人的时候就不瘸！”另一件事就是批斗马本堃教授。马教授被人举报把《毛主席论教育文选》改成“天主教文选”，这是“极其恶毒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还专门组织全系师生观看了反革命证据：在一本《毛主席论教育文选》封面上放了一块特殊的光学玻璃片，透过玻璃片可以模模糊糊看到封面上有用红蓝铅笔画的左一道、右一道。据马教授交代，是大人没注意，被不懂事的小孩子画的，他发现后，就用橡皮擦了，可能擦得不够干净，被人举报了，于是三天两头地批斗。有一次批斗时，马教授不肯承认是有意的反革命行为，Y师傅在我身后一声暴喝：“你他妈还讲不讲理！！”吓得我一激灵，只见前排几个同学冲上去，动手打了马教授，马教授蹲在地上抱头哀哀直叫！

1968年秋，因为66、67、68三届毕业生离校，有很多宿舍楼逐渐空置了，有一些同学不愿意在原来的宿舍挤着，陆陆续续自行跑到空置的楼里去住，也没有人强行干涉，其中中南楼就是这样的情况。到1971年的“4.26事件”发生时，中南楼所住的学生很杂，有原来“兵团”的人（其中就有原“兵团”的几个头头如方××等），也有所谓的“逍遥派”，还有宣传队依靠的所谓“一支力量”。这些人，大多数白天回班系参加活动，晚上回到中南楼睡觉。例如我班的孙××同学就是这样，他自己一个人在2楼占了一间宿舍，天天晚上焊收音机玩到半夜。

我从未参加过“造反兵团”，对“兵团”的那几个头头，也是我知道他，他不认识我。所以在怀柔头一个多月他们要求平山头、批派性时，我说：“我没有山头，我只是一个对宣传队在‘批清’运动中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群众！”

## 2、吊诡的“批清”运动

宣传队在师大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简称“批清”。

“5·16”本来是出现在1967年春夏之际的一个小小的组织，号称“5·16兵团”，他们的矛头所向非常明确，就是指向周恩来。当时在北师大、学部和一些其它地方，一夜之间贴了许多周的大字报、大标语。但很快就被群众镇压下去了，相关的人员，抓的抓、斗的斗、跑的跑。

周恩来在1967年9月18日对外交部讲话中说：“对5·16问题，第一不要把5·16问题扩大化，到处抓5·16，不要把5·16和很多组织都联系起来，与5·16有关的人是很少的，哪有那么多的5·16呀！”

1967年9月1日中央领导出席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江青说：“5·16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方面军，是拆台的，从‘左’右动摇主席为首的中央，想乱我们的套。”“5·16不仅把矛头指向总理，还指向康老、伯达和我”。康生说：“5·16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推翻毛主席司令部。”

从上面的几段讲话，不难看出，周恩来认为“5·16”是很少的。而江、康等人的意图很明确，即“不仅反周是5·16，反对我们的也都是5·16”。

吊诡的是，自从1968年以后，已经不怎么提“5·16”了，却在1970年左右从上到下又掀起一股“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的运动。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5·16”。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5·16”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

### 3、宣传队把部分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从一开始，师大宣传队就提出“抓5·16和其他反革命”的口号，后来干脆喊：“（师大是）黑手两边插，5·16两边抓！”所以，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蓄意要扩大化、把矛头指向群众，包括指向谭厚兰对立面的群众。

从根源上清查谭厚兰等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极左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能说清楚砸孔庙是对是错吗？敢批判谭厚兰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问题吗？众所周知，谭的这些所作所为都是在她后面的那条黑线操纵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谭也是被人利用的牺牲品。谭的身后有一条黑线，这在师大尽人皆知，直接操纵她的就是《红旗》杂志副总编（下图：某次“革命行动”之前集合队伍）林杰。康生1966年7月27日在北师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众宣布：“还有人讲林杰同志有后台，后台是谁呢？



后台是关锋，这里边有一条线索说关锋的后台是陈伯达，是我！你们来审查审查，我们算不算黑帮？算不算黑线？”1967年8月底关锋、林杰倒台了，谭居然在9月1日召开大会，宣称要与革命左派林杰站在一起（见本期资料4），甚至派革委会副主任D××率众到《红旗》杂志社游行示威以示声援。正因为有后台，在1967年8月底以前，谭厚兰一直是顺风顺水。今天出一个《在北师大的军训团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经验，

登在两报上，明天谢富治又跑到师大开一个“大批判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北京的高校中，谭的对立面是最弱小的，这不是因为她正确，而是她始终受到那条黑线的百般呵护。

所以，在1970年前后开始的“批清”运动中，长期站在谭的对立面的、受那条黑线打压的群众总认为宣传队的“批清”是在“假批判，真包庇”，是在“把水搅浑，转移斗争大方向”，一厢情愿地期盼在批谭的过程中能彻底揪出她身后的那条黑线，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这种期盼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可笑的，也是因为这种幼稚，这些人有时会做出许多不为旁人理解的“蠢事”！

宣传队也许不了解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人不听话，干扰他们执行上面制定的“大方向”。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矛头指向这批人，要在这些人里面“抓坏人、抓反革命”，最后干脆硬要给这些人扣上“5·16”的帽子，因为江、康等中央领导说了嘛：“反对我们也是5·16！”这就不可避免地把这些持不同意见的群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在这种背景



下发生了“4.26”事件。

### 三、初入“校办监狱”

#### 1、我住进了谭厚兰修建的“校办监狱”

1971年11月7日，我被押送回师大，关在11楼二楼西头的一间房间里，看守换成了师大学生，都是物理系64级的同学。三个人（有时两个）白天晚上和我住在一间屋里，厕所所在楼道里，上厕所由一个人跟着，吃饭他们上饭厅替我打来。从此不让出去，也没有放风时间。开始的一个多星期关在这里，也许是专案交接工作还没做完，这一个月多星期里很少审问。

这座楼文革前是留学生宿舍楼，文革开始以后，外国留学生陆续回国，这座楼就空了下来。谭厚兰成立师大革委会以后，把11楼的一部分改造成了“校办监狱”，专门关押他们抓捕、绑架的师生，楼道里用拇指粗的钢筋焊了铁栅栏，栅栏上有一个铁栅栏门，锁上以后人就出不去了。到我住进来时，楼内的人很少，一天到晚楼内静悄悄的，偶尔听到铁栅栏门的咣当声。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座“校办监狱”。有一年革委会突然宣布揪出了一个“尚文廉反党集团”，都是历史系学生，具体的情况不清楚。我在历史系64级有一个好朋友叫李万庆，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瞎扯。有一天中午，他正在饭厅吃饭，忽然冲进来一群打手，将一只人造革的空提包望他头上一套，扭着胳膊就把人抓走了。拉到一辆车上转了半天才到地方，用铁丝捆上他的手脚，扔到一个房间里才拿去头上的提包，李万庆仔细一看，这不是11楼吗！审问他与“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万庆是个老实人，平时说话都磕磕巴巴，哪见过这个阵势？至于和“尚文廉反党集团”的关系，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交代不出来就打。那时候，谭厚兰手下有一批打手，大部分都是体育系的男生，一个个膀大腰粗，一身蛮力。最出名的是两个：一个外号叫“黑狗熊”，一个外号叫“白狗熊”，

这两个家伙打人最狠、最多。这些打手手持胳膊粗的木楞、镐把没头没脑对万庆一顿暴打，打得他死去活来，浑身是血。打完了再用烟头烧，烧烂了他一片胸脯！

就这样天天拷打、烟头烧，万庆实在是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对看守说，我身上都烂了，衣服上都是血，让我去水房洗洗衣服吧？看守同意了，万庆进了水房，趁看守没注意，跳到水池上，撞破了纱窗跳楼自杀！万幸的是，他跳下来的楼层不高（好像是二楼或三楼），正好窗下有一丛丁香花树，他掉在这棵丁香树上，只是腰部摔伤了，命保住了。

关了一段时间，实在查不出问题，后来就把他放了。万庆放出来后有一天中午到我们宿舍找我，向我诉说他在“校办监狱”遭的罪，脱下衣服让我看胸前被烟头烧的一片疤痕，那疤痕的面积足有一本书的大小。一个大男人，边说边哭，我又难过、又愤怒！宿舍里其他同学一声不吭，静静地听他一个人哭诉。

这件事使我更坚决地站到了反对谭厚兰的立场上，我绝不认同这个残暴的革委会！

还有一件事对我的刺激也很大。1967年夏季，革委会在大操场召开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大会。我因为好奇，挤到会场最前面紧靠主席台的位置看热闹。只见两个军人扭着彭德怀的胳膊，把他押到会场，彭剃了个大光头，没法揪头发，这两名军人一人一只拧他的耳朵，用力很大，把耳根都撕裂了，鲜血顺着彭老总的脸颊往下流，彭老总疼得大声吼叫：

“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要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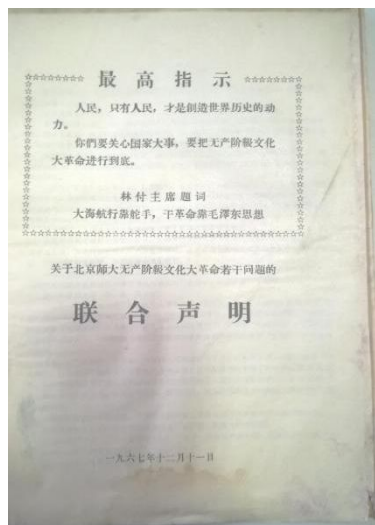
批斗罗瑞卿的时候，是几个军人用一只竹筐把他抬上来的。罗的一条腿打着石膏，据说是跳楼时摔断了，不能站立。有人就找来一只三脚圆凳，又不让他好好坐在凳子上，把凳子翻过来要他坐在凳子腿上。还有人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幻灯机，打出一束蓝光照在他的脸上。

我在台下看到这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钻出人群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 2、我的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九·七事件”以后，快到年底的时候，中文系Z××、物理系Z××等人牵

头，串联了全校13个系、部，63个井冈山公社内的“战斗队”，商量着要起草一份《关于北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见本期资料5）。当时联络了十几个人，在主楼的一间屋子里开了若干次会，讨论起草声明内容，Z××让我去参与了讨论。最后《声明》起草完了，有人说，咱们最好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来发表这个《声明》才好，商量的结果说就叫《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吧。1967年12月，《联合声明》在“兵团”广播站播出，播音员是一个被一些人骂作“喇叭虫”的L××，这只“喇叭虫”中气



十足、字正腔圆，把这篇包含4个大问题、共计1万2千字的声明播得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用今天的眼光看那篇《联合声明》，它并没有脱离文革语境的窠臼，但在《声明》的最后喊出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井冈山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友联合起来！”的口号，在当时全校许多厌恶派性斗争，主张联合的中间群众中确实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师大“海派”的由来。其实据我所知，所谓63个“战斗队”，有不少也就一两个人。《大海编辑部》后来还写过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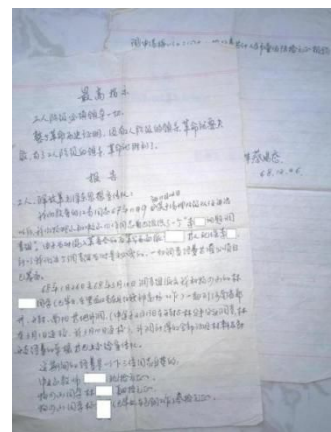
声明，但没有太大的影响。声明发完了也就散伙了，并不是一个群众组织，但“海派”的主张和思想却深入人心，后来凡是持主张联合、反对一派打压一派观点的群众，都把自己看成是《大海》一派的。

也就是在这个《大海编辑部》，我认识了中文系的几位教师，他们是一个叫《井冈××》战斗队的成员。此后，我时常去这些老师家玩，他们当时正在调查原中文系的党总负责人、校革委会常委L××，认为L××经历复杂、想查一查她有没有问题。这个调查组主要在×××老师家活动。1月底，他们说L××是河南人，提供了很多线索，准备派人去河南外调，于是由×××老师捐了90元钱，物理系62级的学生林××、杨××分别捐了40元和30元钱，于1968年1月26日派我和物理系62级的林××、袁××三个学生去L××的老家河南外调（其中袁××较早退出调查）。

1967年夏，学部有一个叫吴传启的人贴周恩来的大字报，遭到群众反击后逃到了河南。我和林××在河南南阳汉剧团有一个调查线索，找一个叫张晓钟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这个张晓钟见人自来熟，特别能侃。说着说着就说起了吴传启，他说：吴是他的表弟，前些时还来他这儿住了一些日子。他问吴怎么来了？吴说，我贴了周总理的大字报，有人要抓我，曹大姐叫我出来躲一躲。他问吴：曹大姐是谁？吴答：是康老的爱人。

那天好像是他们单位管盖章的人没在，天也晚了，我们就说，明天我们先去别处，你把我们今天找你调查的情况写一下，让单位盖个章，过几天再来拿你写的材料吧。等过几天我们去取回材料后才发现，这家伙把关于吴传启的那一段话也写上了，这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南阳，160元钱三个人在外面跑1个多月经费十分紧张，也不能为这么个材料回去找他重写。

那一个多月，每天只能吃一、两毛钱的饭，河南有一种发面的大（下图：申请底稿）饼，一顿饭只买一小牙充饥，后来没钱坐车就步行。我是3月10日回到北京的，这时候我的棉鞋底后跟都磨穿了，撕了一块旧毛巾垫着脚后跟回到学校。



这份涉及康生和曹轶欧的材料，拿回学校后谁也没有说什么。宣传队进校以后，1968年11月6日，连同其它的调查材料都交给了宣传队，12月26日×老师让我给宣传队写一份报销申请，宣传队还把×老师、林、杨三人垫的调查经费报销了。

就是这样一件事，后来竟成了宣传队整我的“主要罪状”。说实在话，在师大那个环境里，谁听到张晓钟说的那件事，都会有些想法。但我至今后悔的是，回校后对同班的三两个人说了，因为大家观点相同，平时在一起无话不说，我说：“康生如果不支持人炮打周恩来，为什么要给吴传启通风报信？”

事情在1967年4月8日发生了激变，那一天物理系赵亮坚先生和他的夫人突然双双触电自杀。赵先生文革前给我们上《普通物理》课，对我们班的学生一直视如兄弟子侄，关

系非常好，运动中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活动，所以观点上自然也差不多，接近《大海》的观点。谭厚兰的革委会为了整治这些人，就借清理阶级队伍为名，造舆论说赵先生是美国特务（赵是旧辅仁毕业），准备办他的“学习班”。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自尊心强，不肯承受这样的侮辱，在办“学习班”的头一天自杀了。这件事对我们班震动很大，有一位同学很紧张，认为我们一切都错了，这回让革委会抓到把柄了，于是跑到系革委会主任D××那里揭发了我“怀疑康生的问题”，以示与我们决裂。D××立即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当时的情况下，这可是了不得的“反革命罪”。去河南外调，无限上纲说你是“专门去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也有口难辨。我当时又急又气，一股火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后来我借口养病跑回了南方老家，暂时躲开了这块是非之地。等我从南方回校后，宣传队已经进校。在抓到怀柔之前，从来没有人再对我提起这件事。

### 3、一次不顾一切的冒险

如果有人问我，长时间单独隔离关押，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告诉他：孤独、惶恐、渴望向自己的亲人、朋友倾诉。

从4月26日关到11月中旬，已经半年了，身边没有一个真心善待你的人，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会落得个什么下场。真想向亲人倾诉自己的心情和处境，真想知道是否因为我的问题连累了他们？

在11楼里关押的那几天里，我注意观察了一番，发现虽然环境很压抑，但也许是正在交接过程，看守并不太严。夜里自己到楼道里去上厕所，看守我的同学睡自己的大觉，没人起来跟着。有一天半夜我在厕所里呆了半个小时，回去没有反应。而且还发现，走廊里通向外面的铁栅栏门有时会忘了上锁。

11月中旬，我听看守的同学之间交谈，好像要把我转移到西北楼学生宿舍继续隔离，担心到那儿以后人多眼杂，与外界联系更困难了。就在那几天偷偷地给苗致平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叙述了我的思念和担忧，介绍了半年来我的真实情况，贴了一张在怀柔时托小战

士为我买的4分邮票，怕寄到师大被人截了，信封上写的致平家里的地址，收信人写的她母亲的名字。11月14日后半夜，趁看守都睡熟了，我外面套上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单秋裤，不顾一切的跑到了楼下。不敢在校内邮箱投寄，从南校门跑到了校外，在经过门卫时，幸亏无人盘查。我跑步到小西天附近的一个邮筒投出了这封信，又跑步回到学校，回到11楼监室内，也不知道一共用了多长时间，看守们还在睡觉，没人发现我出去过。

这封信她母亲收到了，老人看后把信交给了她的女儿，不但没有责怪女儿，反而嘱咐女儿要善待我这个“反革命”，要等我出来。几个月后我出来了，去看她老人家，言谈之中我对同时被抓的另一位同学没有事实求是，乱招供的事略有怨言，这位睿智、慈祥的老人轻轻地说了一句：“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逼那孩子的呐！”

#### 四、那一道道苦辣酸甜，怎一个“忘”字了得？

##### 1、打态度

11月16日，我被转移到西北楼三楼的325房间（南面从中间往西数第三间），继续单独隔离，还是两、三位看守与我同住一屋。我不知道为什么继续关着我，我怀疑康生的事都说了，再说也是那些东西。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一位姓Y的排长，Y排长一个劲地对我说：“希望你起来革命，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划清界限，不要上坏人的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叫我揭发×××，据我所知，他也就是和我一起怀疑过康生，别的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事你叫我说什么？

见我一直不开窍，Y排长很生气。有一天上厕所小便，进去时他已经在里面，见我进去了，他尿完了不走，盯着我看，他这一盯着看我，我就紧张，半天尿不出来。这时Y排长愤怒了，从后面推我一下，说：“你尿哇，你怎么不尿了？”我的脸突然磕在墙上，压抑半年的怒火一下爆发了，转过身和他大吵起来。我说：“你们想干什么？我有多大问题？你们这样对我！！”大概看我的样子太疯狂了，他的态度一下子缓和下来，说，“你先回

屋，我们再和你谈！”

第二天专案组十几位全体成员在三楼中间的大房间里开会，对我“打态度”，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全体专案人员。在一张大会议桌旁，我坐在一端，Y排长坐在另一端，其他的人围坐在桌子周围。我看到，这些专案组成员中，只有两位是我同班同学，其他基本都是64级的学生。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发言，大意都是要我端正态度，交代问题。说实在的，别人说什么我都没往心里去，他们说什么都伤不着我，但我在意同班同学，毕竟一个班六、七年了，总有一些同窗之情。让我感动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垂着眼睑，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她当时的形象让我记了一辈子，在我倒霉的时候她不肯对我落井下石，我感激她！

## 2、好汉张道经

搬到学生宿舍关着，虽然只能在上厕所和洗漱时由看守跟着去，但在楼道里还是会遇到熟悉的同学，通常他们看见我都装着没看见。到西北楼的第二天去水房洗碗，刚一进去，就迎面遇到64级的W，他也是被抓到怀柔的人之一，原来我们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一见他，情不自禁“哎”了一声想和他打招呼，只见他急速地轻轻地摇了摇头，把眼睛转向别处，迅速从我身边出了水房。

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11月底的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刚在厕所里蹲下，只见急匆匆进来一条大汉，见到我一愣，回头看了一眼，看守我的同学没进来，迅速地凑近我悄悄地说：“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我喜出望外，小声说：“明天还这个时间，我在这里等你！”从此，通过他我与外面有了一条联系的秘密通道，每过几天，他就替我传递一回书信。

他就是张道经，一位典型的山东好汉。说来也是缘分，道经是我入师大认识的第一位同学。1965年8月26日他和我同一天到北京，同一时刻到师大东门的新生接待站，都是物理系的新生。我背着一顶江西草帽，他背着一顶山东草帽，我俩一同从学校东门走到西

南楼。他热情万分地对我叽叽呱呱说了一路，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山东话，他那口淄博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就这样，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成了好朋友，虽然不同班，却比许多同班同学关系还要密切。这主要是因为道经是一个豪侠仗义、敢于担当的汉子，与他交朋友让人放心。

在““十二月黑风””中，他们班的C××因贴了“反革命大字报”，成了抓捕对象，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连夜买了车票将C××秘密送上火车逃回老家躲过一劫。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分配他负责检查收到的举报信。有一天，道经发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电子专业的×××老师做学生时在57年“反右”期间有所谓的“右派言论”，信中言之凿凿，有时间、地点、在场人名。他当时就愣住了，心想这封信只要进入宣传队的视野，必定会进入“清队”审查程序，那位老师就惨了。想到此，道经悄悄地把那封信藏了起来，晚上到那位被举报的老师家把那封信给他看了，那位老师脸都白了，然后当着那位老师的面把信扔到煤炉中烧了。事后道经说，这事过后他也后怕，之所以要给那位老师看看这封信，是怕万一那位举报人再次举报，好让被举报的老师有个思想准备。

我这一生结交了不少朋友，道经是我最难忘的一个，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勇敢地伸出手，帮我度过那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在撰写这篇回忆录时，我问他当时为我传递书信是否害怕过？他说：“没有害怕过，当时只是觉得兄弟有难理应相帮！”

### 3、笼中书简

在怀柔时，可以通过“学习班”的解放军和师大宣传队与外面通信、寄钱，外面也可以向里面送信、送东西。回到师大后，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被宣传队切断。有一次，我把在怀柔苗致平给我送衣物的包袱皮请他们还给她，都招来了一通审问：“为什么要把包袱皮给她？那以前是包什么用的？”疑神疑鬼、十分可笑，所以为了不给她找麻烦我也不再通过宣传队和她联系了。她求宣传队给我送过三封信和其他物品，除了一件棉衣全部被宣传队扣留，到最后也没人交代这些信和物品到哪里去了。



致平知道我关在西北楼以后，有时候故意跑到325室的对面串门，对面住着一位她认识的女同学L××，进来出去大声地说话，让我听见，但专案组不让我们见面，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那种思念更加强烈。12月18日，我让道经传了一封信给她，信中说：“我身边连你的照片都没能带上一张，‘4.26’那天晚上我上衣没穿，就被抓走了，你的照片在我上衣口袋的夹子里，前些天我向他们要那个夹子，他们没给我，他们是不会给我的。如果你同意，就让他（道经）带一张你的照片给我吧。”



第二天，道经给我带来了一张照片，照片夹在一张字条中。这张照片是我们俩在“4.26”前一周的1971年4月18日照的，地点颐和园后湖，上海牌120（上图：1971年4月18日，颐和园后湖）相机自拍。那是一个星期天，这里幽静安宁背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我们俩坐在一颗横在水边的树干上，年轻的脸上笑容粲然有如周围的春光，完全感觉不到灾难的逼近。这张照片成了我们终身的纪念，它见证了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见证了我们不平凡的感情历程！此后，只要有机会去颐和园，我们一定要去当年拍照的地方，照一张和当年的角度相同的合影。

从保留下来的这个阶段的书信看，回师大后12月底以前一直还是逼我交代问题。我在给致平的信中通报了他们安在我头上的罪名，对怀疑康生问题非要我承认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收集黑材料。11月24日我的信中说：“今天下午找我，说我还有重要问题没有交代。我说，哪些问题没交代能否给我举个例子。他们说：‘L××调查组的问题，就没交代清。’还说：‘师大三大调查组，马建民、刘镛如、L××调查组都是调查康老的！那两个是兵团搞的，L××这个是兵团、大海一起搞的。’看样子是不顾一切要把L××调查组打成黑调查组了。”“我自己有错误我自己承担，想叫我陷害大家是不行的。我没有在组内（指L××调查组）议论过谁，我们在组内也没有讨论过或议论过那份材料中涉及到的那件事。”“这件事可能会找你的麻烦，但也不要怕，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把你怎么样，

不管怎样我绝不连累你，只要你平平安安我就放心了！”

她在给我的来信中，一如既往地说她在外面很好，叫我放宽心，要坚持实事求是，同时通报了外面的情况。1月19日我给她的信中说：“我现在就等着他们最后拿出事实来，靠假口供总是不行的，总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但是也有可能到毕业的时候仍然不放我，因为我没有顺着他们的意图乱编，因此借口我的问题没搞清不让我毕业，那样的话我就害了你了！想起这些心里万分难过，五年来我没有给你多少温存，倒给你造成许多痛苦和烦恼，到最后还让你为我吃了这么多的苦，我对不起你！我对你欠下的这笔债永远也偿还不了！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也和我割不断感情，所以希望你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回师大后，从来没有放风一说，只有一次开全校大会由两名同学跟着，搬张椅子远远地坐在会场后面。长期不见冷空气，又不活动，那一次外出引起了严重的冷空气过敏，手、脸、脖子只要是裸露在外面的地方都起一片片的疙瘩，奇痒不止，这个毛病很多年以后才慢慢痊愈。那一年春节我在囚室中度过，看守我的同学有些也回家了。

春节前，我收到致平节前的最后一封信：“对你学习班的人，由于看管你要影响一些



自己的利益（如回家），心里对你有气，你对他们态度要好，平时少找他们的麻烦，现在这样做有好处。春节到了，你特别要把心放宽，目前一切都是暂时的。W××春节回××结婚，L××、W××也要结婚了，Q已结婚，大S、老G都回

（上图：同城“两地书”）家了，大家都很好，我也还好，你放心。”这些用各种大小不同、颜色不同的纸张写的信，记录了我在囚笼里的真实情况和思想，也记录了她超常的冷静、坚定和柔情。

#### 4、渴望自由

现在回想当年的境遇，在西北楼关着的那几个月里，如果没有她不断通过道经送给我的这些密信，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那几个月，真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她不断地叮嘱

我“要放宽心”，“要想得远一些”，“要实事求是”，她的嘱咐和柔情，使我顶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坚守住道德良心的底线。在一封信中，她说：“马本堃就是个例子。”马教授不管怎么压、怎么打，就是不承认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

有一天，我在桌子底下捡到一张废纸，好像是专案组哪位同学写信时扯下的废纸，上面有几行字，其中有这样几句“目前工作进展不是很顺利，估计要解决问题还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领导也不急于结案。”看到这个，我心里十分烦躁。1972年1月14日我给致平的一封信中说：“从12月份到现在又接连好几个星期没有找我，也不布置学习内容，成天不理不睬地呆着，每天我自己在宿舍看书。我不抱什么幻想，可能就是要这样一直关下去，短时间内是不会放我出去的。道经下月要回家，你要有什么事在他回家之前告诉我，他回家期间我就不能和你联系了。我回来后就收到你送来的棉衣，别的什么也没收到。望你也多加小心。我一定会实事求是，现在我根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2月4日我给她的信中说：“我心里有些难受，这一阵主要是春节到了的缘故。到三、四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还会难受一阵的，到六月份要不放我还会难受。我真渴望自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求他们或胡说一气，都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去干那些没有用的事。”

就这样咬牙坚持，整个1、2月份就这样相持着。那一年的春节是2月15日，春节过后不到一个月，1972年3月8日，终于宣布对我结束隔离审查，我部分恢复了自由，回班级“接受群众监督”。

## 五、“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

### 1、劫后重逢

1972年3月8日，我结束了319天被囚禁的生活。出了囚室我才知道致平早就病了，诊断为肝炎，在校医院住院。我到服务楼商店买了一斤白糖赶紧去了医院。

她住在医院二楼的一间病房里，脸色苍白，躺在那里。近一年没见面了，见面了我却

不知说什么好，她见我的第一句话却说：“你受苦了！”我们相拥而泣，诉说分别后对彼此的牵挂和思念。我感谢她近一年来按月给我母亲寄钱、写信，免去了她老人家对我的担心。同病房的病友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我们从下午说到入夜，忘了吃饭、忘了天黑。

从她的诉说中，我才了解到11个月来她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我们刚抓进去时，她和一些同学到处奔走投诉，企图营救被捕的同学，无人理睬。回到学校，宣传队还要他们交代投诉营救的问题，说：“你们不是会告吗？你们送给×××的材料现在都在我们这里！”宣传队要她揭发我的问题，那个L××专案组的一些活动她当时也参与了一些，宣传队老怀疑我有什么材料藏在她那儿了，逼她交出材料。我确实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藏在她那儿，当初她知道我有怀疑康生的想法都害怕，不许我在她面前议论这些事情，所以她确实没什么可揭发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交出来的。

元旦之前，她给我写了信，买了几张贺年卡。那时的贺年卡就像后来的信用卡、银行卡那样大小的一张塑料卡片，一面印着样板戏的剧照，一面印着年历。她求宣传队把信和这几张贺年卡转交给我，宣传队一看，那几张贺年卡的剧照印的是《智取威虎山》，顿时火冒三丈，把她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你什么意思？你是想骂我们是座山雕，他是深入虎穴的杨子荣吗！”把信和贺年卡全部扣下了。

她是一个心里有事不露在脸上的人，禁不住这样时时施压，天天敲打，元旦过后不久，她就病倒了，吃不下饭、恶心、呕吐，到医院检查转氨酶比正常值高出几倍。那时候医疗水平也不高，就按肝炎治，也就是给点维生素，吃些中药。到我放出来时，虽有好转，但仍不正常。

每天去校医院看望致平，都要穿过“绿园”（现在好像已没有了）。有一天，在“绿园”迎面遇到当初L××调查组的一位中文系老师，见到他我高兴地和他打招呼，没想到他冷冷的说：“你在里面交代了不少问题吧！”我的心情顿时恶劣到了极点：当初是你要调查L××，我一个跑腿的调查时吃尽了千般苦，出了事我在里面扛着，如今你还说这样的话！作为比我们年长许多的人，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难道你想不到，如果我真“交

代”了什么对你不利的东西，你能脱得了干系吗？

## 2、烈女刘月英

我到医院探望致平的时候，在楼道里经常看到有一位下肢瘫痪的女生，杵着双拐在别人的搀扶下练习走路。那女孩个子不高，身材瘦弱，累得满头大汗，小脸憋得通红。我问致平：“那是谁呀？”她说：“外语系的，叫刘月英，兵团××的女朋友。××被抓到怀柔去以后，宣传队说，抄家时在××的褥子下面搜出了避孕套什么的，当众羞辱她。她受不了，就跳楼自杀，没死成，腰断了，下肢瘫痪，不知道还能不能走路了。”

后来我听说，刘月英是一个山东农村的女孩，家里很穷。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师大外语系，和我们同届。这个要强的山东姑娘，入学第一个学期所有学科全部满分，在一年的时间里入了党，当了学生干部，她是一个要脸的人。“4.26”她的对象××被抓走后，军宣队一位参谋在外语系全系批判大会上当众羞辱她，说搜出了什么什么，说：“他们可是还没结婚哪！”那以后的几天里，刘月英一直不说话。几天以后，又要开全系批判大会了，眼看着一场加倍的羞辱不可避免。当同学们都去会场以后，这位刚烈的姑娘从女生宿舍中北楼西侧的四楼阳台跳了下去，用死来抗争这一切！一位去水房打水的生物系女生正好经过楼下，看见她摔到地下，没死，用手死死地掐自己的脖子，被送到医院救治后，她绝食，她是真不想活了！在老师、同学们的日夜劝解安慰下，她总算活了下来。毕业分配时她希望师大能给她口饭吃，哪怕在资料室打打字，师大不留她。令人鄙视的是，她的恋人××从怀柔回来以后也与她中断了恋爱关系！她被抬回了农村老家，贫困的家无力为她治病疗伤，又把她抬回了师大，就这样一次次抬来抬去，最后她死在了师大外语系党总支办公室。

今天的孩子可能不会理解当年的事，为这么一点事还至于跳楼自杀？就像全世界的人们不理解，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为什么会判处通奸的男女当众用乱石砸死。在那时的中国，一点点生活绯闻就常常致人于死地！宣传队那位恶毒的参谋，不知道在你的这一生中，当你拥妻携子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可曾想到过有一位娇弱的女孩死在了你的恶意

攻击下？你心中是否有过一丝丝的歉疚？

### 3、毕业鉴定

我放到班级以后，进班的第一天，由一位姓S的教师带领班级领导小组严肃地向我宣布纪律：“你现在结束了隔离审查，但仍在群众监督之下，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不许串联，不许自行外出，出去必须报告，经过允许才可外出！”

我出来不久就宣布要进行毕业分配了，很快就进入了毕业鉴定阶段。在作毕业鉴定前，物理系宣传队负责人白本章师傅向我宣布：鉴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属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问题”，上级决定要在我的毕业鉴定中“记上一笔”。所谓的“小组鉴定”实际上是宣传队早就拟定好了的，他们拿出一份鉴定草稿给我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蔡鸣乔同志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在68年利用去河南外调的机会收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黑材料，并在小范围内散布过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言论，经领导和群众帮助，该同志态度较好，建议不予处分。”白师傅说：“你在自我鉴定中也必须写上这些内容，如果不写，对你没有好处！”我说：“我自己做的事，我可以承认，但要实事求是，要准确。有几点我要说明：一、我怀疑康生是5·16后台，是谭厚兰后台，这是事实，我什么时候也不翻案。我希望明确写上怀疑康生，不要含糊其辞地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以免以后搞不清楚，引起误会。二、我上河南外调并非去收集什么黑材料。在河南外调是有一个外调对象在材料中涉及曹轶欧的一件事，是偶然的，并非有目的地去调查。但回来后我曾将此事向几个同学讲过，这确有其事。三、我认为5·16是一个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集团，我的问题和‘批清’运动无关，我犯错误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但可以说是‘受错误思潮’影响。”

对我提出的几点意见，白师傅的答复是：“可以考虑你的意见，至于极‘左’思潮还是‘错误思潮’的提法，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一样的。”

后来在我的小组鉴定（也就是宣传队鉴定）中，把其中的“在68年利用去河南外调的

机会收集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的黑材料”一句删掉了，把“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改成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康生同志”，但仍然坚持“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我在自我鉴定和个人对小组鉴定的意见中又重申了我是“受错误思潮的影响”，以表示我对鉴定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提法的不认同。

当时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为我向宣传队求情，说：“他这么年轻，给他档案中写上这些，对他一辈子都会有影响啊。”宣传队说：“就是要给他记一笔，让他老实一辈子！”

#### 4、真感激你与我艰难同行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那时候在档案中装进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一生、对他的家庭子孙后代会有多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就像脸上刺上了金印，走到哪里都不会被信任和重用，遇到政治运动都不可避免地要被折腾。那几天我很郁闷，有一天在宿舍里躺着，另一张床上躺着我的一位同学蒋锡久，其他人都不知上哪了。一开始我俩都不说话，忽然，他开口了：“蔡鸣乔，我给你讲个笑话吧！”见我没有反应，他自顾自地讲了起来，听我还没有反应，他又说：“我给你唱一段‘空城计’吧。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的老蒋兄弟，我知道你见我心里难受，千方百计地要哄我开心呢！

我们这位蒋兄在运动中是一个典型的从不理解到有抵触、不掺乎的智者。他有很多雅好，是一位有名的围棋高手，爱摄影、会唱戏，结交了大量的同此雅兴的教授、同学、社会上的朋友。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被出卖、被伤害、被歧视的时候，善良的老蒋给我的温情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因为背上了这样的政治包袱，怕连累我深爱的人。我对致平说：“你跟着我，将来恐怕要吃苦了，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两家的老人，都怪我的愚蠢，连累了你们！”她不许我说这些。那些天，我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我们在大操场南、北饭厅北面路侧的双杠旁聊天，我又为档案里“记一笔”烦恼，她却说出了一句让我万分震惊的话：“我们还要活很长的时间，二十年以后，谁还记得康生是谁呀！”多少年以后，我对她说：“当年

你还挺有政治远见的嘛！”她却微笑地回一句：“我那时就是为了安慰你！”

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和我一起分配到东北边陲。因为她的病到分配的时候还没痊愈，她母亲特地到师大找了一回宣传队，要求让女儿暂缓到分配地报到，留在北京把病治好。宣传队不同意，说，五.一以前必须离校，否则取消毕业生资格！

那一年的4月28日，我们在宣传队一名军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北边城。到单位报到才一个月，致平的病就复发了，剧烈地呕吐，转氨酶急剧升高，在医院又住了两个月。

1971年12月，致平曾站在雪地里照了一张相，这是一张侧面半身像，照片中的她面带微笑，眉眼间却露出一丝隐隐的忧伤。我给这张老照片取名为《冬日笑靥》，题辞曰：

“笑靥如花，掩不住眉间愁煞。心非铁石，怎禁得日日敲打？那人儿在里面，能不牵挂？也不知收到未，寒衣鞋袜？冷风刺骨盼春暖，不信严冬永无涯！心神遭折病缠身，未曾痊愈又出发。闯关东，再告别爹妈！”

## 六、尾 声

我被分配到一所刚从民办改为公办的中学，一年后的1973年，一年试用期满应当转正。那年3月，学校管人事的曲大姐好心地向我透露：“你档案里有东西，对你的转正班子开会有人不同意。你写封信去北师大，要求他们把你档案里的东西撤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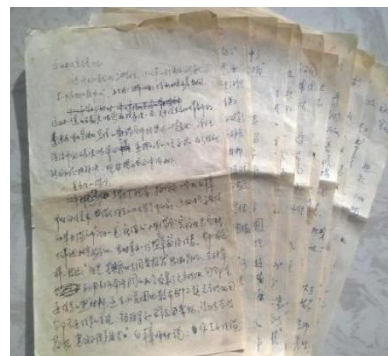
我立即给师大宣传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为我的前途着想，能不能修改档案中的记载？3月16日他们回信说：“你给陈师傅的信，谈到对犯错误结论修改问题，原对你记一笔的结论是争取了群众意见，专案的同志反复研究，后组织又多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本着批判从严组织结论从宽定的，同时也经上级机关审批的。对你的结论是慎重的，即不能修改。请你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如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你所在的单位组织反映，由组织与组织联系为宜。”落款是“物理系”，信封的落款是“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师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



1975年，我接到大学时辅导员郝老师的一封信。郝老师告诉我，前些时，师大曾给你们单位去了一封公函，落实批清政策，要把档案里的一些东西撤了。我立即去找了单位领导，单位领导说：“是收到这样一封公函，但你的问题在你的毕业生登级表里记着，也不能把毕业生登级表销毁了呀，我们没法处理。”并且让我抄了这份公函的内容，里面说“1972年4月份涉及到你处原我校学生蔡鸣乔，在批清运动中有所牵连，经复查，属犯一般政治错误，根据北京市委关于落实批清政策，对犯一般政治错误以下人员不作文字记载，材料不入本人档案的规定，本人或组织在其自传……毕业生鉴定、毕业生政审已入档案的材料中，凡涉及批清运动内容的一律撤销……”落款是“中共北京师范大学领导小组”。

我看了这份留尾巴的材料，说：“那就不动吧，把材料撤了，留一个‘犯了一般政治错误’的尾巴，有什么用？”

1978年冬，打倒“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我的问题还没解决。12月，我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师大“运动办”找到一位叫石长庚的同志长谈了一次，他让我回去后立即写一份申诉材料寄给他。我回来后立即写了这份材料，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及我的遭遇，寄给了师大“运动办”。



（上图：申诉材料底稿）

我背负着这个政治包袱，为了我深爱的妻儿，我必须证明我不是“反党的反革命”。为了能得到“信任”和“认同”，我用拼命工作来“赎罪”，带别人不愿带的最乱的班，教最多的课，干别人不愿干的工作，有病、有事从来不敢请假，我“老实极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使我的免疫力极为低下。1978年底，从北京回来不久，一场重感冒居然让我患上了无法治愈的免疫功能疾病“肾小球肾炎”，并最终恶化为尿毒症，在亲人、朋友的帮助下做了肾移植才保住了这条命。

1978年12月30日我住进了医院，这一天距师大党委为我作出最后的平反决定只差3天！我在医院病床上收到师大党委寄给我的平反通知，信中说：“蔡鸣乔同志：学校对你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决定平反，恢复名誉。复查结论已寄你校党支部，通过组织向你本人

宣读。关于你的档案，我们要求你所在支部加以清理。此致敬礼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  
79.2.10”。

学校党支部书记在病床边向我宣读了这封迟到的平反结论：“蔡鸣乔，男，物理系 70 届毕业生。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怀疑康生等问题，受到审查，并于一九七二年作了‘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一九七四年撤销了这个结论。经复查，蔡鸣乔同志主要是怀疑康生、反对四人帮的黑干将谭厚兰，是正确的。据此，对其审查是错误的。现决定撤销原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销毁与此有关材料。中共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总支 1979 年 1 月 3 日 同意物理系总支关于蔡鸣乔同志的复查结论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1979 年 1 月 3 日。”

1971 年冬，我在囚室里关着的时候，致平和她的好朋友 W 照了一张雪中漫步的合影，这张老照片我给它取名为《冰霜路》，曾在上面题辞：

“彤云密布，前程似雾，初践冰霜路。谈笑不言愁与苦，年少难将天心悟。问痴女，顶风冒雪，心儿欲往何处？”

在结束这篇回忆录时，让我步前韵续一阕上面的无牌小令：

“残生向暮，韶华难驻，惟有情如故。拿捏旧伤夜无眠，善恶忠奸谁无数？告苍生，少些褒贬，留与后人评述。” ■

2016 年 1 月 10 日初稿

2016 年 1 月 26 日第七次修改

【述 往】

## 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闻天关押在北师大

冯启明

故事发生的年月日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时间坐标（1969-1972），那是北京师范大学去东方红炼油厂劳动的日子里。班里和厂里同学们都去东炼了，我由于胃出血处恢复期，系里留下我并给我两个任务：一是看管全班行李，二是为低温楼（五七半导体器件厂所在地）日夜值班。8643班去劳动前，全班行李（包括我的行李）全部集中在物理楼三楼的一间教室内。关闭时间长了，教室内会发出一阵阵难闻的霉味，我发现后，每隔三五天就去通风一次，并在门框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贴上小纸条，以确定教室内无人进去。由于我的生肖是狗，那时我自嘲为“看门狗”。

在低温楼值班的日子里，发生了一则鲜为人知的故事。有一天，我在低温楼值班室里弹着月琴（跟姜德圣学的，姜德圣喜欢弹月琴，弹得很好听，于是我也买了一把月琴胡乱弹着），突然来了一位手持校革委会介绍信的人，此人凶神恶煞，不讨人喜欢。来说，要在低温楼地下室关押一位重要人物，请你帮忙看管和送饭。我断然拒绝，我说，我既要保管物理楼的行李物品，又要看管低温楼全部仪器和设备，实在忙不过来，看管和送饭请你另找别人吧。凶神悻悻地走了。

当天，果然一群人领了一位老人进了地下室。由于上厕所要到一楼，所以关押老人的地下室没有关门。我带着好奇心进了地下室，看管人员早已下班走人了，只剩下老人一人坐在床沿。老人方正脸，白晰的脸上已长有寿斑，脸色憔悴而又忧伤。看着地下室十分简陋，我说，给你去拿一只电炉和水壶来。老人开口了：你是常州人吧？（常州口音和江阴

口音十分相近，老人识别能力很强。)我说，我是江阴人，听口音你是江南人吧？老人说，我是南汇人（江苏南汇县，现为上海浦东新区），我叫张闻天。如雷贯耳，面前是一位大人物。

我说，他们把你抓来干什么？张说，不知道，大概要批斗吧。我说，斗来斗去实在没有意思！楼上是北师大五七半导体器件厂，那才是为国家办实事的地方，厂长也姓张，扬州人。我们江苏人都是自强不息的。张说，江苏自古出人才。我开始讲江阴抗清 81 天，全城殉国的故事：清军重兵 30 万围困小小江阴城，江阴军民誓死不降清，派出军校到常州明军将领史可法处求援，军校尚未到常州，史可法已殉国。江阴军民，众志成城，固守江阴 81 天，清军死 3 王 18 将，死士兵 10 余万人。破城后，江阴军民顽强巷战，全城殉国，孩童无免，十分壮烈。张说，整个中国，都是不屈不挠的。

第二天，我又去和张聊天。我说，我有办法领你出去。科研区门房是一位阴阳人，看门看得很紧，但我知道围墙的小豁口在何处，我可领你离开这里。张说，没有用的，回到家里，他们又会来抓的。第四天，我再去地下室时，已人去室空，不知去向。

文革中，一些人心理已经扭曲。各所高校在比赛谁批斗的人物大，谁就是最革命的。清华批斗了王光美，北京外语学院批斗了陈毅，师大批斗了彭真、彭德怀……，这次关押的张闻天，大概由于学生在东炼劳动而没有举行批斗。■

（此文作于 2009 年 12 月 12 日，选自北师大 8643 班的新浪博客）

【述 往】

## 怀念“插班生”杨以鸿

赵惠中

杨以鸿同学原来比我们高一个年级。在1966年12月17日，他与刘中柱一起在北师大校园里贴了一张题为《林副主席也是可以批评的——给林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要同“壮志坚信马列”的“林副主席”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讨论一下“顶峰论”问题。文中认为：无论是从社会科学还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分析，事物总是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当然也是要不发展的。把毛泽东思想誉为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岂不是要窒息毛泽东思想，使其不再有所发展？……

就因为这张大字报，他立即被打成“反革命”，先被关入监狱长达半年之久，后又被送回北师大“群众专政”，在后勤部门“劳改”，到了1968年12月，68届毕业生分配了，他因是“反革命”而不分配，继续“劳改”，于是他就成了我班的“插班生”。

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开始时他基本上与我班同学不来往，而我班同学没歧视他。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个学习尖子，高考时是江西省理科前十名之内的。大家看见他“劳改”之余还在学英语，学理论物理，有时会偷偷地到华罗庚家去请教偏微分方程。班上的同学对他还是比较友好的，并且还暗暗佩服。因为他是“反革命”，所以下“东炼”（东方红炼油厂的简称）时他就首当其冲了，结果把一截手指头贡献给“东炼”了。到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他的“罪名”才自然消亡了。但却仍不给他平反，不给他分配工作，甚至还有一种论调说：“林彪是毛主席树立的接班人，他们在68年反林彪还是不对的”。直到72年4月才与我们一起被分配到陕西陇县中学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从68年12月到72年4月，他在我班共三年加五个月的时间，早已与我班融为一体了。后来听说他被李政道招为研究生，在固体物理方面有所建树，属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



1987年的7月，我随单位到北京旅游，就住在师大服务楼的招待所内。(1)班留校的安宝生告诉我，杨以鸿又回到了北师大很有成就。可惜的是得了癌症，现正在中日友好医院治疗，看样子很危险。知道这一情况后，我立即与安宝生再加上(3)班的许永康一起去中日友好医院看他。

(左起：安宝生、杨以鸿、赵惠中、许永康。安宝生现任北师大珠海工程技术学院院长)，许永康文革中因言获罪备受打击，89年参加民主运动，91年被投入秦城监狱，2000年逝世)

他好像对自己的病情严重性不太了解，还很乐观地说病好后还要做什么什么。我们也不敢都说什么，只是劝他好好养病，祝他早日康复！心中默默地希望医学能早日攻克癌症，把杨以鸿抢救回来。

大约在1988年2月中旬，安宝生给我来信说，杨以鸿走了，信中告诉了我开追悼会的日期。但我收到信时，他的追悼会早已开过了，我除了痛惜之外，只能希望他一路走好。后来安宝生又给我寄了一份1988年7月1日出版的《师大周报》，此报以整整四个版面以“专号”的形式发表了题为《生为追求，死为追求——记英年早逝的杰出物理学家杨以鸿教授》长篇纪念文章。这报纸我至今还保存着。

从这篇报导中我了解了许多他的故事，其中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很多。作为大学同学来说，还想重点谈谈他的“劳改”生涯。由于其“反革命”身份，他被迫在北师大后勤部门“劳改”长达四年半之久。长期的非正常生活，政治上被划为“另类”，精神上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与摧残，导致了身患乙型肝炎，给他最后得重病埋下了隐患。这是其“劳改”生活给他带来的最大恶果。但有失也有得，这期间也让他有两大收获：一是遇到了也在劳改的我系教师刘辽（摘帽右派），他就与刘中柱在劳动间隙向刘老师学习相对论，学习理论物理，为日后出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遇到了政教系63级的张梅英同学，他们患难与共，相惜、相爱并最后结婚生子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至于他日后工作以及赴

美留学和在物理界创出骄人业绩，因我不了解详情再加上篇幅有限就无法细述了。我只能简单地从系主任杨展如教授在杨以鸿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中摘录部份作为此文的结尾吧！

“杨以鸿教授是江西省新干县人，1946 年 10 月生，1987 年身患肝癌，经多方治疗无效，不幸于 1988 年 2 月 3 日午夜逝世，终年 41 岁。

杨以鸿同志 1968 年毕业于北师大物理系，毕业后在陕西陇县中学、宝鸡师范学院任教师。1980 年考取首届 OUSPEA，赴美国留学，1984 年以优异成绩在犹太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继续在该校做博士后工作，在一年内即被聘为研究副教授。

杨以鸿同志在学术上勇于进取，他在科学上一项突出成就就是发现碱卤化合物中色心与分子缺陷（掺入的 ON 分子）相耦合引起的分子振动荧光辐射和受激发射。并由此开创了一种新型红外激光器。

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导致色心物理、非线性光学与红外激光等领域的一系列实验的理论进展的可能性，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不久前，由这种荧光辐射研制成的激光器已经在美国申请到了专利。

杨以鸿同志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祖国的建设，1986 年 8 月毅然谢绝美国犹太大学的高薪聘请的较好的实验条件而返回祖国，立志为祖国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这的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杨以鸿同志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公开表示自己的正确观点，以致受到了错误路线的残酷迫害。

杨以鸿同志在学术上勇于进取，工作上敢于开拓，生活上艰苦朴素，能团结同志，在工作上的生活上乐于助人。

以鸿同志意志坚强，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在病中还念念不忘工作，不忘周围有困难的同志。……..

杨以鸿教授，安息吧！” ■

2009. 06. 25

## 【资 料】

**首都红代会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严正声明**

1967年4月13日

一、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伟大的战略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发动了总攻击，亿万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地投入了这场伟大斗争。形势好得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即将在这大好的形势下宣告成立。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千方百计地在革命组织之间拨弄是非，挑起争端，转移斗争目标，恶毒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一切革命同志都应当放眼全局，以革命利益为重，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随时警惕阶级敌人的阴谋活动，千万不要上当。

二、关于四月十一日、十二日新北大公社和地质东方红等革命组织之间所发生的严重冲突，我师大井冈山公社根本没有参与。有些人无中生有地向中央文革反映我们的“情况”，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表示遗憾。我们一向认为，红代会所属各革命组织之间如发生意见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相互进行批评，特别要自我批评，求得正确解决，而不要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以至于对立起来，冲突起来，致使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三、我师大井冈山公社坚决支持首都工代会、首都农代会、首都中学红代会。有人针对这些组织，提出“夺取”、“砸烂”、“彻底改组”之类的口号，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一切革命同志务必提高警惕，谨防政治扒手。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解放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决支持革命左派，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对于解放军的某个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提出意见。决不允许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原载《井冈山》第29期 1967年4月13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师大井冈山公社主办）

【资 料】

## 为建立我校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而斗争

——谭厚兰同志代表公社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摘登）

1967年4月21日

同志们，战友们：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决战的关键时刻。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多年来被他们所篡夺的党政大权坚决地，彻底地夺过来。这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性的一战，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决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归根结底就是夺权。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回顾一下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去年六月初，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猛攻程今吾，就是要夺以程今吾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程今吾一小撮则组织力量反扑，就是要保住他们的权；以后，工作组进校，革命小将给他们贴大字报，炮轰工作组，就是要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的权，而工作组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就是要保住他们的权；震动全校的“八·二”大辩论，从内容到形式，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工作组御用工具——校文革的权，而校文革组织力量反扑，也就是为了压制革命群众，保住他们自己的权；以后伪筹委会，伪红卫兵师的建立，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想方设法要保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而我校无产阶级革

命派组织起来，成立井冈山战斗团，其目的就是要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把师大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句话，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就是夺权！

今年一月，在伟大的“一月革命”的风暴中，我们井冈山公社，代表全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意志，一举砸烂了以程今吾为首的黑党委，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夺了过来，真是好得很！无产阶级革命派由过去的无权变为掌权；程今吾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当权变为失权，整个师大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这是师大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奇迹！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我们一定要正确领会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方针，认真地执行这个方针，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不折不扣地去办！

十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充分证明，井冈山公社是一支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资产阶级路线作斗争中厮杀出来的革命队伍，它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它始终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它是师大广大革命群众的代表。实际情况也已表明，广大革命群众对井冈山公社是支持的，拥护的。否定井冈山的大方向，就是否定师大的文化大革命。因此，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必须以井冈山公社为基础。“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建立，必须有助于加强井冈山的领导权，而绝不是削弱井冈山的领导权。井冈山公社的代表在“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中必须充分发挥重要作用，而绝不能只是作为陪衬。如果不承认或贬低井冈山公社代表的作用，就是否定革命群众，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师大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以井冈山公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这一点一丝一毫也不能动摇。

我们也要充分估计革命干部参加“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作用。革命的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一些革命的领导干部，政治上比较成熟，组织能力较强，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他们有为无产阶级国家掌权和管理业务的能力。只要他们和群众结合，和革命造反派结合，就可能在“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对这点缺乏充分的认识是不对的。

从我校的情况来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最近以来，一些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勇敢地站出来亮相了。他们揭发以程今吾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检查、改正自己的错误，用实际行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大杀回马枪，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井冈山公社热烈欢迎，坚决支持。

当然，我们必须严重注意，不能把坚持错误、不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的人强加在群众头上，硬拉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中来。如果这样做，那就不是革命的“三结合”，那就根本谈不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那就会出现反复，甚至使已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上台。

事实上象程今吾这样一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千方百计歪曲“三结合”，削尖了脑袋要往临时权力机构里钻。程今吾不是说他“不是黑帮”，而是“受打击的以对象”，“有结合的可能”吗？同志们，我们必须警惕，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

我们学校是一个革命左派组织井冈山夺了权的单位，建立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必须强调，参加“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人员，必须是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的革命左派，他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正确地按党的政策办事，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能破私立公，为党为阶级利益而奋斗；他们有革命干劲，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我们要结合的干部，必须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他们必须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决支

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必须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他们必须以实际行动揭发以程今吾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发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投身于火热的群众运动，总之是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优秀代表。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个临时权力机构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

当然，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怀疑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反政府主义思潮。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其道而行之；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

同志们：建立一个“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是关系我们政权性质的百年大计。我们必须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搞群众运动，大搞群众性的大审查，真正做到群策群力，献计献策。在“三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害怕群众，不要害怕批评，害怕议论，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我们真正走群众路线，就一定能完成“三结合”的战斗任务。在我们师大，就是要大力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充分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建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是一场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各个阶级在这个关键时刻都会登台表演，力图为自己的阶级争权。种种迹象表明，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那些一再声言要进行“二次夺权”的个别头头，他们近来似乎又开始活跃起来。对于这种阶级斗争的动向，我们千万不可放松警惕，必须加以充分注意。对于一切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的企图。我们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我们应当以百倍的信心，千倍的毅力，排除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坚定不移

地为建立我校“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而努力。

同志们：建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是我们师大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头等大事，是我们井冈山公社战斗历程中的头等大事，它关系我校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和今后的方向。战友们，让我们积极地行动起来，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努力工作，为早日建立我校“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而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井冈山》第32期 1967年4月21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主办）

#### 【资 料】

###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通告

1967年4月29日

- （一）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宣告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党、政、财、文各项大权，从即日起，归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
- （二）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暂由三十三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领导干部两名，民兵代表一名，学生二十二名，教师五名，工人三名。
- （三）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晚，举行了公社常委、公社委员、各大队长、指导员全体会议，通过协商，同意由原常委吸收革命领导干部二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 （四）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由谭厚兰同志任主任委员，石森、董连猛、曾昭耀三同志

为副主任委员。

## 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主任： 谭厚兰

副主任：石森、董连猛、曾昭耀

常委： 石森、马建民、谭厚兰、董连猛、李五全、樊立耀、周耀文、邵忠诚、曾昭耀、  
黄贵贤、李少明

委员： 李志德、武汉、林晓芒、周耀文、段挥方、李桂芳、樊立耀、淦家森、李焕景、  
贺乔奇、张纪兰、董连猛、李五全、李革、江华生、李克臣、黄家林、叶林生、  
谭厚兰、邵忠诚、申家兴、周树志、黄福林、何文魁、吕俊清、石森、马建民、  
李坤德、李少明、黄贵贤、曾昭耀、刘继岳、王炳照 ■

### 【资 料】

## 谭厚兰在“九·一”保林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当前形势是大好的，大好形势最重要的标志是，全国全市，上上下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对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少奇之流从政治、军事、思想上的大斗争、大批判的高潮。市革委会在我校召开大批判现场会后，进一步掀起了大动员、大批判的高潮，形势就是好的很！这正击中了敌人的要害，这正是置敌人于死地！

从我校来看，市革委会在我校召开现场会，这是对我们巨大的鼓舞，对我们的大批判也是大检查、大鞭策。我们红卫兵和全校革命师生遵照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进行了肯定成绩，找出差距，把大批判推向新高潮的总结活动。这个总结，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很多系、班和战斗队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

同志们学得很好。这个总结的过程，也是同志们互相学习的机会，系与系、班与班展开了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活动。这次总结，也是我们向兄弟院校学习的好机会，很多兄弟院校做出了更好的成绩，我们向他们学到了好经验，这就更进一步端正了我们对大批判的态度，进一步认识了大批判的意义，这也是个大的动员。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紧跟毛主席的，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是最听毛主席话的，所以，我们师大的形势，也像北京和全国的形势一样，好得很！

革命大批判，标志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搞不搞大批判，就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检验一个队伍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小资产阶级逍遥派、摇摆派的标志。但是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的，就是面临着这样一个大好形势，正当大批判进入新高潮，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发出更大攻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它们批深批透，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看到：有些家伙正在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大批判的高潮。他们这样做，就是从根本上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阶级敌人的一个大阴谋，我们每个革命同志，一定都要提高警惕，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大批判的大方向，戳穿敌人的阴谋。我们坚定地认为，谁要破坏革命大批判，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就是反革命！我们一切革命同志要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动摇，就是要坚持大联合、三结合，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

现在要说一下，同志们提到的一些问题。同学们最近听到一些流传，大街上贴了打倒林杰的标语，说林杰犯了错误，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暂不要管它，我们抓的是问题的本质。但我们的态度是，第一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不管前面有多大风浪，有多少激流险滩，不管要我们付出多大代价，甚至生命鲜血，我们都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对于发生的一切问题，我们的最高准则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用毛主席的阶级观点去分析，谁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拥护谁，谁反对毛

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打倒谁！第二，从一年来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革命的大风浪中我们认为林杰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信得过他。对于发生的一些问题，坚信毛主席，坚信中央文革小组，定能作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的任务，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新功，立新劳！

大批判的过程，就是坚持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个司令部的激烈复杂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更深入的阶段，必然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这种斗争的形势就更加尖锐、更加复杂，这就更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它，用毛主席无产阶级阶级观点去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正确的结论。坚持革命大批判，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过程中，我们就是要誓死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革命大批判的大方向，不管有多少曲折，不管有多少干扰，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的同志们，一定能够排除干扰，一定能够把大批判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师大井冈山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中央文革亲切关怀下，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英勇斗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一定的贡献。我们井冈山战士，是忠于毛主席的，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忠于中央文革的。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谁要否认我们的大方向，是办不到的，是捞不到半根稻草的。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反对周总理，说我们整理了周总理的材料，还说什么勒令我们交出来，（众呼：叫他们见鬼去吧！）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师大井冈山，从来坚信周总理。这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污蔑我们反周总理的唯一证据，就是我们坚定地反击了“二月逆流”。而他们为了保他们的主子，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他们认为我们反二月逆流却是“逆流”。二月逆流倒是“红流”。我们要问，难道你们保谭震林保对了吗？难道你们保余秋里是保对了吗？难道你们保陈毅是保对了吗？我们师大井冈山人，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



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声望多大，都要打倒！还有人说什么我们在武汉支持了百万雄师，说我们双手沾满了武汉革命派的鲜血，要我们低头认罪。你们有什么法宝，就拿出来吧！我们和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贡献我们的力量。我们要积极响应江青同志号召，文攻武卫。我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要拿起笔，做刀枪，同时要拿起武器，武装自卫。谁敢反对毛主席，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大批判这个大方向，我们就要和他坚决斗争！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衡量一切，分析一切，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我们的红卫兵战士、革命师生，一定能够遵照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毛主席战略部署，忠于广大劳动人民，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永不变色，保卫我们国家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不但把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要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为世界革命作出我们的贡献。

打倒刘邓陶！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誓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刊登在北师大第 67 期《井冈山》报第一版、第三版

据 1967 年 9 月 2 日师大 67 期井冈山报翻印

【资 料】

**最高指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林副主席题词**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关于北京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

**联合声明**

1967 年 12 月 11 日

**一、形势**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汹涌澎湃的大海狂涛，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席卷了北京师大。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年多来，古老的北京师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曾在师大横行一时，称王称霸的程今吾等党内走资派，孙有余反动工作组，伪筹委会、伪红卫兵师、林杰阴谋反党集团以及刘邓陶的大大小的代理人，被英雄的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排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种种干扰，逐步地、深入地、巩固地得到树立。

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绝对权威的胜利史，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诋毁这种绝对权威的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及思想行为进行生死大搏斗的革命史。

毛主席说：“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人民群众越来越充分地发动起来，以越来越高的革命自觉性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正是目前形势大好的最显著特征，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最基本的原理。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林副主席的最新题词，是响彻云霄的冲锋号角。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又一次掀起了大规模宏伟的大树特树毛主席思想绝对权威的群众运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师大形势同全国一样，也一派大好。

“九·一”这是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要转折点。林杰阴谋反党集团倒台了。这个一手泡制“李春秋定理”<sup>1</sup>（即：北师大李春秋的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的反革命两面派倒台了，林杰是“绝对权威”，谭厚兰碰不得的神话破灭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滚滚洪流向李春秋分水岭发起猛烈的冲击。

“九·一”之后的三个月里，尽管林杰的幽灵仍在千方百计地护卫那个破烂不堪的分水岭，但是经过严峻阶级斗争洗礼的井冈山革命派，越发深刻地看透了“李春秋定理”的反动性，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自觉性空前提高了。他们在大好形势下，不忘阶级斗争，决心不再沉默下去，而要亮明旗帜，摆明观点，更加奋勇地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

<sup>1</sup> 李春秋定理五个字原文没有引号，引号是本刊编者加的。

的绝对权威而战！

一场彻底砸烂“李春秋定理”，在师大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暴风雨正在来临。

这标志着师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更广阔更深入的新阶段。

让那些认为“九·一”以前形势大好，“九·一”之后形势不好，日夜怀念自己的“全盛”时期的人们向隅而泣去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 二、彻底砸烂“李春秋定理”

### 为在师大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是仅仅推翻一个党内走资派程今吾吗？

是仅仅赶走一个孙有余反动工作组吗？

是仅仅打倒一个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吗？不是，绝对不是！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但还不是根本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从根本上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沿着胜利的航道前进！

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可以拔掉修正主义根子，保证世代永远不出修正主义。

不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即使从党内走资派手中夺了权，这个政权也可能改变

颜色，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出现大挫折大倒退。

不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即使打倒了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重新出现修正主义。

可以断言，有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有了一切；没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就丧失一切。

所以一切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诋毁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他们可以树立大大小小的权威，甚至把自己及同伙打扮成党的化身，但就是不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并在“反老子就是反党”的招牌下，大反毛主席，大搞修正主义，他们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装作“革命权威”的模样，假装给革命小将以支持、援助、荣誉、权利以至于一切，但就是不给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革命小将变成他们的驯服工具，从而丧失自己的一切。

反革命两面派林杰，正是这样一个狡猾的阴谋家。他从一开始，就带着不可告人的野心插手了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也曾表面上支持革命小将，起来反程今吾，反孙有余，使不少人对他感恩戴德，不胜崇拜。

在这些金字招牌下，他利用广大革命群众向孙有余工作组和伪校文革夺权的强烈的革命要求，从资产阶级夺权观出发，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假革命的分水岭”的错误口号，并不顾广大革命派的坚决抵制，进而把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逐步发展成其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理论基础，这样就形成了诋毁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大树谭厚兰个人权威的臭名昭著的“李春秋定理”。

这个定理的要害是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高领袖地位分庭抗礼；

这个定理的本质是攻击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这个定理的危害是大大妨碍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师大的树立；

这个定理的目的是为林杰阴谋反党集团实现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狼子野心作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这个定理的后患是使修正主义不能在师大斩草除根，埋下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伴随这个理论而来的是对谭厚兰肉麻的吹捧，什么“紧跟谭厚兰，彻底闹革命”啊，什么“恭恭敬敬地做谭厚兰的小学生”啊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满天飞舞，团史展览里竟出现了葵花的谭厚兰的画面，谭厚兰相片的数量竟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相片的数量相等，“井冈风暴”的演出里反复出现谭厚兰的光辉形象。……

强化这个定理的杀人不见血的大棒之一是所谓大反“新思潮”。林杰、谭厚兰借反无政府主义之名，对许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小将，对许多和他（她）们有不同意见的井冈山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按照“李春秋定理”，不管你出身如何，品质如何，是铁杆老保也好，是李少明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客也好，只要拥护我谭厚兰，就可以加官晋级，飞黄腾达。

按照“李春秋定理”，不论你政治表现如何，是英勇不屈的造反派也好，是革命小将、革命干部也好，只要反对她谭厚兰的错误，就要受到迫害，被打入阴山之下。

井冈山战斗团的第一批战士，有多少只因为坚持革命原则，和谭厚兰的错误言行发生了争执，就被一棒子打了下去！

师大的革命造反派，有多少同志只因为反对了谭厚兰同志的错误，就被扣上了反动“新思潮”的大帽子！

师大的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少革命干部、革命教员，只因为和谭厚兰在兵团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就被划入不革命、假革命，甚至反革命之列。

在“李春秋定理”之下，出现了下面令人难以容忍的怪现象：

谭厚兰炮打周总理，跟着去炮打的受到重用；反对炮打的，倒受到打击。

谭厚兰怀疑伯达、江青同志，跟着去怀疑的，当作心腹，垂以青睐；反对去怀疑的，当作异己，加以排斥。

谭厚兰和林杰阴谋反党集团坐在一条贼船上，跟着去坐的，视为忠臣孝子，竭力提拔；反对坐的，看作逆子贰臣，予以迫害。

和谭厚兰同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反革命两面派林杰曾以太上皇的姿态说：“我听毛主席的，你们听我的。”其实，他听毛主席的是假，他企图蒙蔽群众去跟着他反对毛主席却是真的。这就是林杰之流泡制的“李春秋定理”的险毒用心之所在。

必须彻底砸烂“李春秋定理”！

### 三、对于师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若干重大问题的具体态度

##### （一）关于师大革命委员会：

师大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

为了使师大革委会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红色政权，我们从来认为，必须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观察一切问题，分析一切问题的唯一标准。在这个革委会里，不管是什人，什么事，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反对。绝对不允许以反对还是拥护谭厚兰等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真假革命的分水岭。只有毛泽东思想真正成为革命委员会的灵魂，只有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中心形成全党全民的团结，才能够保证这个革委会的无产阶级性质，才能够领导我们坚决彻底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种坚持“李春秋定理”，大树谭厚兰个人的权威而诋毁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人；那种吹吹拍拍，阿谀奉承，毫无革命原则，庇护谭厚兰同志错误的人；那种投机取巧，图谋私利，发展个人势力的人；那种用人唯亲，排除异己，压制不同意见，大搞一言堂的人；那种费尽心机，挖空心思，对井冈山造反兵团进行大围剿的人，实际上是红色政权的蛀虫，他们是在动摇、腐蚀侵袭我们的红色政权，这对谭厚兰本人革命，也是没有丝毫好处的。

## （二）关于师大井冈山公社：

师大井冈山公社是革命的。

师大井冈山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师大和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过和正在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谭厚兰等人在林杰操纵之下干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勾当，沾污了师大井冈山的荣誉，井冈山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贯是有斗争的。一部井冈山团内斗争史就是井冈山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林杰反党阴谋及谭厚兰贯彻的错误路线进行抵制，斗争，为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斗的历史。

为了保持井冈山的鲜红颜色，必须彻底肃清林杰在师大的一切流毒，彻底砸烂“李春秋定理”，让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伟大红旗在井冈山上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 （三）关于井冈山造反兵团：

井冈山造反兵团是革命的。

井冈山造反兵团的核心和骨干曾是井冈山战斗团的骨干和创始人，是井冈山公社很多战士和社员的很好的战友。他们曾经大造程今吾黑帮的反，大造孙有余反动工作组的反，大造刘、邓、陶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尤其是与反革命两面派林杰及潘、吴特务、叛徒集团，进行了长期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尽管他们身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他们仍不愧为奋勇前进的革命闯将，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井冈山战斗团的分裂，完全是反革命两面派林杰一手造成的，那种认为井冈山造反兵团是分裂主义产物、是复辟势力的代表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质是在为林杰开脱罪责。

井冈山造反兵团已经成为师大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为彻底砸烂“李春秋定理”，在师大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而英勇战斗着。对它采取不承认主义的态度，甚至把它打成非法组织的做法，是极端愚蠢、极端错误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



最新指示中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以，我们认为应当给井冈山造反兵团以合法地位，保证他们能够进行革命的正当权力。

我们主张，井冈山公社与井冈山造反兵团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

#### （四）关于谭厚兰同志：

谭厚兰同志是革命的。

谭厚兰同志犯的错误也是极其严重的。

谭厚兰同志错误的要害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不树立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去树立她自己和反革命两面派林杰的绝对权威；不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忠于反革命两面派林杰；不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去揭发林杰反党阴谋集团，而听林杰反党阴谋集团的话去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谭厚兰的那句所谓：“打得倒就打倒，打不倒就拉倒的”的极“左”名言，不正暴露了谭厚兰同志是师大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吗？不正暴露了谭厚兰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的灵魂吗？

谭厚兰同志另一个最大错误是，一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甚至欺骗群众压制不同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搞一言堂，以致激起团内外群众很大的不满。

但是谭厚兰同志在她的11.15检查中，避重就轻，回避要害，并且埋下了日后为林杰翻案的钉子。对于这样的检查我们根本通不过！

尤其严重的是，谭厚兰同志在检查之后，不但不拿出实际行动来改正错误，反而对造反兵团展开了冬季攻势，压制群众，坚持错误更变本加厉了。我们奉劝谭厚兰同志必须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否则终究要被群众运动的滚滚洪流所淘汰！

#### （五）关于师大某些人与“5·16兵团”黑关系问题：

大量事实证明，师大某些人与反革命5·16集团以及潘、吴、穆、卢等叛徒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师大内部也多次发生反革命案件。但是，师大在揪坏人方面一直收获甚微，师大阶级斗争的盖子一直没有完全揭开，这不能不引起每一个革命师生员工的严重注意。师大的阶级斗争盖子，一定要彻底揭开，师大某些人与“5·16”的黑关系，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 （六）关于反“新思潮”问题：

长达几个月的反“新思潮”运动是林杰策划的大阴谋。

它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

它借反无政府主义之名，把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的大帽子扣在革命小将头上，从而掩盖了师大最大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林杰。

它巩固和强化了李春秋反动定理，严重阻碍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师大的树立。

它严重压制了广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扼杀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许多正确意见和批评，为林杰实现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野心做了组织准备。

反“新思潮”的大方向，必须彻底否定！

#### （七）关于“九·七”事件：

“九·七”事件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其目的是为了从师大打开缺口，进而搞垮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掩盖他们尚未暴露的部分。

中央和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师大“九·七”事件的三个文件，及时、果断地粉碎了这个阴谋，好极了，英明极了，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决策。

那种认为“中央的文件下来得太早了，再晚几天就好了”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们的立场完全站错了。

对“九·七”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真正的幕后操纵者，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永记“九·七”事件的深刻教益。

#### （八）关于“九·一”以来的群众运动：

“九·一”以来广大群众打倒林杰，炮轰谭厚兰，追查“5·16”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九·七”以后，谭厚兰利用樊，黄，李等少数人所搞的专政委员会的事件，来发泄怒气，镇压群众，到处清洗、罢官、批判、斗争革命群众，把首先起来大造林杰反革命集团反的革命群众都打入颠覆红色政权之列，变本加厉地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压制不同意见，大搞一言堂，是完全错误的。

肃清林杰流毒，砸烂李氏定理，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群众运动必将更加汹涌澎湃地兴起。

#### （九）关于复课闹革命：

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在复课闹革命中是有成绩的，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必须充分肯定。复课闹革命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必须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伟大斗争中，把复课闹革命推向新高潮。

复课闹革命的灵魂是闹革命，闹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因此像谭厚兰同志那样，脱离了现实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埋头复业务课，空搞教学改革，就极有可能改良，极有可能复辟，极有可能走进资产阶级死胡同里，这必须引起全体革命师生的高度警惕。

#### （十）关于干部问题：

干部问题是师大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谭厚兰同志按照“李春秋定理”，以拥护不拥护谭厚兰、反对不反对造反兵团为结合、

使用干部的分水岭，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革命干部必须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亮相，必须以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和对待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为结合、使用革命干部的唯一的最高的标准。

师大的革命干部、革命师生员工联合起来，为大树特树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 （十一）关于恢复师大党组织活动的问题：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当前一切工作的纲，抓住了这个纲，就是抓住了斗争的大方向，就能做到纲举目张，就能大大推动我们的复课闹革命，大大推动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这有利于大树特树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当前能否做到这一条，就是衡量我们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不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试金石。

谭厚兰在抛出了她那按照“分水岭”定理泡制的《关于恢复师大党组织活动的建议》之后，又迟迟不搞建党问题上的大学习、大批判，妄图利用李氏定理改造我们的党组织，摆布我们的党员，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办不到的。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 四、高举斗私批修的大旗

####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其本身就包含着一场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比起反党内走资派，反工作组来，不知艰巨、复

杂多少倍。什么革命到头就此止步啦，什么大局已定无可奈何啦，什么虽然是符合毛泽东思想，但不能实现啦，种种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时时冲击我们的队伍。因此，进行这场斗争，需要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与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需要我们去斗私、批修。正如林彪同志所说的那样：“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要斗私！

我们要斗那种不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私；

我们要斗那种不敢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的私；

我们要斗那种不关心祖国前途、世界命运的私；

我们要斗那种不敢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私。

我们要批修！

我们要批赫鲁晓夫那种背叛马列主义的修；

我们要批刘少奇那种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分庭抗礼的修；

我们要批林杰那种泡制“李春秋定理”、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的修；

我们要批那些形形色色诋毁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修！

不忠于毛主席、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大的私，最大的修；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大的公、最高的革命大节、最纯粹的马列主义。我们就是要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革命斗争中，斗私，批修。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2月4日社论中说：“学习毛主席著作，用，还是不用；学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执行还是不执行，这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阶级感情问题、根本态度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像谭厚兰同志那样口头

上大树三天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实际上顽固坚持诋毁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李春秋定理”；绝不能像她那样“言行不一致，口头上说同意，行动上却另搞一套；会上讲的漂亮，会后又不那样去做”。我们一定要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辈子切切实实地坚持不懈地为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目前，我们要尤其注意反对那些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

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仅有两个人，就敢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战，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中说：“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己身上的一条锁链。他们所能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

“一唱雄鸡天下白”，经过亿万劳动群众的长达一百余年的流血奋斗，全世界已经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

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也要庄严地宣告：

让那些形形色色的诋毁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徒子徒孙们，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伟大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这场斗争中，只会失去自己的精神锁链，他们所能得到的却是毛泽东思想红光照耀的整个世界！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井冈山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革命战友联合起来！

为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而战！

为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战！

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

中文系

井冈鏖战急、 井冈红灯照、 井冈风雷、 井冈铁长城、 井冈红旗班、

井冈热风、 井冈星火报、 井冈莽昆仑、 井冈怒骑、 井冈猛虎艇、  
 井冈红哨兵、 井冈心向东、 井冈花烂漫、 井冈呐喊、 井冈送瘟神、  
 井冈大无畏、 井冈竹。

## 政教系

井冈倚天剑、 井冈锓未残、 井冈红峰、 巡天遥看、 井冈太阳升。

## 外语系钢一连

钢一连红旗编辑部、 黄洋界、 战地黄花、 从头越、  
 井冈红五星、 井冈齐声唤、 井冈红旗乱、 井冈莽昆仑、 井冈立新功、  
 井冈烽火、 井冈劲松、 呼声急、 云水怒。

## 教育系

青锋

## 生物系

井冈劲草

## 地理系

独立寒秋，

## 天文系

井冈激浪、 井冈星火。

## 物理系

《八·二〇》、 前傲鹰、 争朝夕、 红四野、 无产者、  
 傲霜雪、 拼刺刀、 横俯、 星星之火、 鲁迅、  
 前驱、 井冈霹雳、 为人民服务、 从头越、 井冈红军。

## 数学系

前哨兵、 忠于毛主席。

## 历史系

革命到底、 井冈炮舰、 井冈火石、 文攻报编辑部。

## 化学系

中流击水

## 校医院

井冈红医

## 幼儿园

井冈韶山

1967年12月11日 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翻印

## 【读者来信】

## 1. 蔡鸣乔谈北师大文革史的三个阶段

北师大文革从1966年6月到1972年4月这段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6月1日到1967年4月29日师大革委会成立。这个阶段的大事件有：谭等奉旨贴大字报造反；工作组进校抓“游鱼”、批斗“黑帮、反动学术权威”；中央文革到校为学生平反；成立红卫兵组织；对李春秋大字报的大辩论；兵团从井冈山分裂；“12月黑风”；大串联中谭厚兰组织人马砸“三孔”；谭组织人马到农林口造反揪谭震林（所谓反“二月逆流”）；谭参与组建首都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师大革委会成立，等。

第二阶段，从67年4月29日到68年8月宣传队进校。谭厚兰组织人马参与揪刘火线、火烧英国代办处；5·16兵团在师大的成员炮轰周恩来；革委会批斗“黑帮”、批斗彭德怀、罗瑞卿、余秋里；九·七事件；造反兵团“倒谢（谢富治）”失败；《大海航行靠舵手》联合编辑部发表呼吁大联合的声明；革委会两次围攻火烧造反兵团的驻地工五楼；革委会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等等。

第三阶段，从1968年8月至1972年4月。这一阶段六一、六二、六三级学生分配离校；工军宣传队组织“斗、批、改”；工军宣传队在校内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工军宣传队组织“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分子”；4·26事件；六四、六五级学生分配离校。

2015-12-30

## 2. 傅正伟谈北师大老五届的历史责任

贵刊的编辑动员我写一写北师大文革的事，我几次动笔，几次放下。一是当年不堪回首——一些事，让我一想起来就血压升高，心堵气闷。尤其是那些丧尽天良殴打老师同学



却逍遥法外的坏蛋。而每每想起那些被冤屈被迫害的老师 and 同学，则让我心疼如绞，连续几天无法安枕。我已是古稀之人，回忆往事，对我来说是折磨，是痛苦。

春节与校友聚会，大家也谈到北师大百年校史中，文革十年是一片可怕的空白，谈到北师大在文革研究方面的严重落后，谈到清华人写的书，北大人出的专辑，还谈到了地质学院的宋翔雁老师撰写的长篇回忆文章。大家很感动，也很感慨——麻木者沉沦，知耻而后勇。北师大也是人才辈出的学校，难道其中就没有一个半个对社会有责任心，对后代有义务感的人？！我举双手赞成天正兄“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号召。

但是，我也赞成胡滨的意见：那些当年参与运动较深的同学，应该首先行动起来。因为，一他们了解情况，知道内情，即使手中缺乏资料，至少脑袋里还有印象。比如谭厚兰下面的二把手董连猛，造反兵团的郑云云、李庆林、王颂平、赵德骏和蒲寿章等人。二他们是运动中的骨干，不管是哪一派，是什么观点，他们都对这场革命起到了旁人没有起到的或正或反的作用。因此，他们更应该对历史，对后代负责，他们应该比一般同学更有责任写下这段历史。

中国文化之根来自史官，北师大人人都应该是母校的史官。为母校写史，为亡友伸冤，也是为国家树正气，为社会寻公平，为后人立榜样。北师大是培养教师的地方，教师的职责之一，就是继承、传递优秀的文化传统，让学生知古鉴今。

是的，我怕回想当年，但是，我不能以身体为由逃避。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北师大的师友们，回避历史是无是非，自甘落后是无羞耻，忘却亡友是无恻隐。作为北师大人，我要以残年余力，用我的拙笔忆往昔，记事件，评人物。我要做到三不怕：不怕出笑话，不怕得罪人，不怕犯时忌。如果我的努力能为弥补校史之万一，此生足矣！

2016-2-22

## 【本刊声明】

##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mailto:dw66778899@163.com)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